

香

歷史

HISTORY

香港——政治發展

HONG KO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中文版

港

光時

HONG KONG

歷史科市場領導

K. W. HO

考場戰神·求敗·高考歷史科
全卷88%分數等A



最強

K. W. Ho 在難度最高的高考歷史科中以 88% 之求敗分數奪 A
歡迎其他大型補習社之 A 級導師挑戰，
本人先讓 20% 分數（約 4-5 個等級）
即使放眼 5** cut off 高達近 80% 分數的 DSE 亦無可超越！

最多

2015-2021 年間教出超過 120 位 DSE 歷史科 5** 門生
其中 2017 年 DSE 歷史科中每 2.7 位 5** 學生
就有一位是 K. W. Ho 門生
戰績無可匹敵，大幅拋離所有歷史科補習導師！

最神

連續 9 年教出新修生（由零開始以不足十個月時間
應戰 DSE）至少獲取 5* 成績
2016 年更有新修學生奪得 5** 成績，創造新修傳奇
2017 年有重考學生由 Level 2 重考躍升至 5**，
創造重考傳奇
（上述學生全部報讀 K. W. Ho 起碼 8 期課程）

最平

每堂低至 \$75
孖住報每期平一半學費（每堂平 \$37.5）
5** 獎學金回饋課程原價之一半學費（每堂回饋 \$37.5）
最盡可以達致 \$0 補習

最方便

以 Online Lesson 形式隨時、隨地上課，
節省交通時間
更有電子版筆記，溫書最方便！

最彈性

課堂進度任由你安排
鐘意上邊個課題就上邊個課題
鐘意幾時上就幾時上
* 大滿貫優惠更可在考 2022 年 DSE 前無限
任 Loop 報讀之所有課堂

最全面

筆記總頁數超過 8000 頁
涵蓋課文、史實、概念、技巧、海量練習
及範文、精讀、考卷
配套無可匹敵

最合適

如果你本來已經使用 K. W. Ho 免費版 Unbeatable Notes
K. W. Ho 將會是你唯一的歷史科補習選擇
聚焦教授課題重點、必學技巧，避過筆記伏位
最短時間助你最有效使用數千頁 Unbeatable Notes 筆記
慳時間，就是補習的最主要原因！



傳奇·誕生

2016 年，首年應考 DSE 只有 16 分的麗雯於重考時才新修歷史科(首年應考未曾讀過歷史科)，最終用了 10 個時間由零開始讀，成功取得了 5**的成績，開創新修傳奇!

2017 年，首年應考 DSE 歷史科只取得 Level 2 的 Felix 上演奇蹟大逆轉，於 2017 年 DSE 歷史科取得 5**的成績，開創重考傳奇!

2016-2020 年間合共打造超過 110 名 5**學生，大幅拋離坊間其他導師! 其中 2017 年每 2.7 位 DSE 歷史科 5**學生當中就有 1 位是 K.W.HO 門生!

就算底子再差，能力再弱，你願意努力、願意學習、願意跟隨，我就會拼盡全力教你。我用心，只希望你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傳奇。

K.W.HO

HISTORY ◊ 實力 · 技巧 · 配套 · 戰績 · 無懈可擊 ◊

光

輝歲月

時

光飛逝

K.W.HO 的話 — 革命·顛覆所有

從小開始，我就不喜歡讀書，會考時開始認真讀書只是為了追女仔，希望能令女神刮目相看。高考後開始做補習導師也只是因為山窮水盡，連袋有當時全副身家的銀包也遺失，迫於無奈只好「賣身」開始補習生涯。一切都是緣份，又或者是宿命。

由執教第一年就已經計劃如何結束補習生涯，但又不甘心自己的付出會隨著自己的退潮而埋藏於世。正如我高考後開設歷史科博客，就是希望能夠將我在高考期間歸納的應試心得及答題技巧、撰寫的數百篇範文公諸於世，流傳開去，令我曾經的努力變成無可估量的價值，改變其他人的思維，甚至乎是命運。

由一開始執教 DSE 課程，我已經訂立了明確的目標——我希望用我的思維、技巧去掀起一場學術革命，破除舊有背誦式的讀法及雜亂無章的答法，確立思考及邏輯性主導的讀法和系統性的答法。學術革命要達致成功，首先必須要提高接觸率及廣泛性。為此，我於 2015 年加盟大型補習社[英皇教育]，並於隨後幾年稱霸歷史科市場，每年門生數以千計，5**學生人數亦冠絕全港，遠超同行。

今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實踐革命夢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利用我多年來嘔心瀝血製作而成的數千頁筆記去推動學術革命。讓學生免費使用我的 Unbeatable Notes 以取代傳統非考試主導、低效用的教科書，藉此達致全面滲透入學生層的效用。除此之外，我也要改變歷史科的市場模式，由過往的「付費學習」變成「免費學習」，同學可以在無須付費的情況下獲得數千頁的補習教材，即使是窮學生也能憑藉強大的筆記提高自己的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為實現學術革命的目的，我歡迎任何學生或老師免費使用此 Unbeatable Notes 作教學，亦希望各使用者能夠將此筆記推廣出去，令學術革命能夠開花結果。

背 · 輸個試

很多人以為我 AL 時以 88% 的求敗分數取得 A 級成績(比一般年份的 A 級成績 cut off 高出達 20% 分數)應該是沒有補習，純粹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而取得。恰恰相反，我的歷史科成績是補習了 3 年的結果。如果我當年只是滿足於會考的 A 級成績，又或者只是滿足於學校的第一名成績，或許就沒有現在的我。

一般學生讀歷史科的最大障礙就是自以為背了課題的內容就可以取得好成績，這是我多年的教學經驗，每年接觸眾多重考生而得到的結論。歷史科是一科對於提問字眼和邏輯推理要求均是極高的科目，在眾多 DSE 科目中被譽為最講究答題技巧的科目也不失為過。然而，許多同學在讀歷史科仍然抱著「背」的心態，雖然可能足以應付校內測驗考試，自我感覺良好，但一到公開考試及放榜時，轉眼就變成「陳再修」，這是每年我所接觸的重考生大多存在的問題，而這些重考生當中不少更是曾經上網購買了我的筆記，死記爛背的學生。

其實歷史科是極為容易擺高 grade 的科目，我有學生由零開始新修歷史科，合共讀了不足 10 個月就取得 5**；也有重考生第一年取 Level 2，然後重考躍升上 5** (可參考《五星星考卷集：傳奇集》)。相比大多科目，歷史科更容易創造出傳奇成績，原因在於歷史科講究思維及答法，同時課程範圍偏小，令理解考試這個遊戲的學生更加容易突圍而出。如果不懂考試，一味以為背就可以取得好成績，最終只會在拉 curve 的考試制度下，淪為上述考試精英的踏腳石。

成績越叻的考生一般求知欲強，慣性思考，學然後知不足，希望透過不斷學習以力臻完善，這類型學生亦普遍被視為是聰明的學生。成績較差的考生一般求知欲低，不好思考但喜愛背誦，自以為背完就能夠應付一切，這類型學生亦普遍被視為是愚蠢的學生。其實要成為一個聰明的學生，抑或是一個愚蠢的學生，許多時並非取決於智商，而是取決於選擇，正如讀歷史科時，你選擇用腦去讀，還是選擇用背的方式去讀？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I acquire, the more certain I am that

I know nothing.”- Voltaire

目錄

學習方向：	P.4
課文：	
I. 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因素	P.5-10
II. 香港政治的發展	P.11-28
大事年曆表	P.29-30
新高中歷屆試題出題趨勢：	P.31-32
資料題：	
DBQ#1 你是否同意香港前途問題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香港直至 1997 年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P.33-39
DBQ#2 資料 A 及 B 能否充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特徵？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P.40-47
DBQ#3 資料 A 對於解釋資料 B 所示的 1991 年直選結果有何用處及局限？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P.48-52
DBQ#4 就反映 20 世紀期間本地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而言，資料 A 和 B 有何用處及局限？試參考資料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P.53-59
歷屆試題參考答案：	
DSE-2020-Q1 你是否同意 1951-1997 年，香港在民主和種族平等皆有改善？	P.60-62
DSE-2017-Q1 香港前途問題是否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P.63-65

K.W.HO 出題分析: P.66-67

論述題：

Essay#1-3 中國因素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 1967-97 年間香港的政治發展？ P.68-76

Essay#4 「中國因素是塑造 1980-2000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主要因素。」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P.77-80

Essay#5 追溯並解釋香港政治於 1950-97 年間的發展。 P.81-84

Essay#6-7 「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持續增長。」試參考 1960-97 年間的歷史，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P.85-90

Essay#8 探討香港政府如何處理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民眾移居香港和 1980-9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P.91-94

Essay#9 1967 年的暴動在什麼程度上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參考 20 世紀期間的香港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P.95-99

Essay#10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在什麼程度上是香港政治發展的轉捩點？試參考 1945-2000 年間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P.100-103

Essay#11 探討 1945 年後英國在香港的統治的主要政治特徵。 P.104-107

學習方向

學習綱要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定稿）（2007年3月）

要點	說明
政治及行政轉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主要發展趨勢 ● 不同發展階段的特色 	通過探究二十世紀初至 1997 年香港在政治及制度上的轉變，學生須指出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不同階段的發展及其主要特色。

主要學習內容

因素類讀法

情況類讀法

I. 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國因素* ➤ 英國因素 ➤ 本地因素 ➤ 國際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於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及局限 ◇ 與其他因素間的相對重要性
II. 香港政治的發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二十世紀初英國統治時期(1900-41) ➤ 日治時期(1941-45) ➤ 戰後政治及制度的轉變(1945-67) ➤ 改革層面的擴展(1967-84) ➤ 代議政制的發展(1984-9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每個階段的概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及地區議會與制度 •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 公務員本地化(整體公務員、政務官、高級官員) • 華人團體(社團、政黨) • 民生政策 ◇ 每個階段轉變的原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國因素 • 英國因素 • 本地因素 • 國際因素 ◇ 每個階段的特徵

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因素 - 中國因素

1. 中國因素對於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性

A. 中國因素推動了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

在與中國簽訂於《中英聯合聲明》前，英國未有積極推動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其中在司級官員方面更加是全部由外籍人士壟斷。然而，中國在 1984 年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達成了「港人治港」的原則後，迫使英國需要加快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以過渡至日後的港人治港。因此，港英政府開始逐步委任華人進入政府任職司級官員，例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先後於 1993 年及 1995 年出任布政司及財政司。更甚，至 1997 年，隨著中國取回了香港主權，香港特首的產生方法完全受到中國影響，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任的籌委會委任出 400 名推委會委員，從而選出候任行政長官，更選出華人董建華成為了首任香港特首，同時，所有司級公務員也由華人出任，「港人治港」的原則得到充分實現。

B. 中國因素促使及影響著代議政制的發展

在間接影響方面，由於中國與英國於 1984 年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會於 1997 年回歸中國。為了避免香港回歸到中國後會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英國政府加快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希望將民主植根於香港，例如在 1985 年分別於立法局進行首次間接選舉及在區議會取消了全部的官守議席，提高立法局及區議會的人民代表性。及後，港督彭定康更於 1992 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改革立法局，全部 60 個議席均改由選舉產生。至於直接影響方面，中國政府對於急進的政改方案十分不滿，指責方案有違《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並且另籌「臨時立法會」，並於 1997 年回歸後取締了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導致該批議員被迫「下車」，直接改變了香港政治歷史的發展。

C. 中國因素影響著政黨政治的發展

由於香港需要於 1997 年回歸到中國的管治，驅使港英政府推行代議政制改革，放寬選舉權，以加強香港的民主成份，結果吸引了不少人士或組織成立政黨以參與立法局及區議會選舉，例如民主黨、民建聯及工聯會，成為了香港政黨政治萌芽的要因。此外，中國因素間接促使了民主派陣營的政黨於 1990 年代深受港人支持，因 1989 年中國高壓鎮壓八九民運的六四事件令港人對中國的管治深感恐懼，因此更加支持民主派陣營，希望藉民主派人士以爭取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避免回歸後陷入中國的專制管治，結果導致 1991 年立法局選舉，18 名直選議員中就多達 14 名是來自民主派陣營。再者，中國因素也直接影響了政黨的發展，因民建聯及工聯會等建制派獲得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在中國 1996 年籌組的「臨時立法會」中，建制派便佔了大多數，更成為了首屆回歸後的立法局議員。

2. 中國因素較其他因素對於影響香港政治的發展重要

A. 中國因素 > 英國因素

- 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導致了英國政府進行代議政制改革。
- 過往英國並不希望下放權力予華人，因英國政府恐懼會影響到其殖民統治，故未有在立法局引入選舉。
- 然而，至香港即將回歸到中國的管治，英國政府為了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以免香港回歸後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故大力推動代議政制改革，甚至准許彭定康 1992 年的政改方案，將全部立法局議席改由選舉產生。

B. 中國因素 > 本地因素(港人的訴求)

- 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才是港人能夠全面參與香港政治的主因。
- 因中國與英國確立了「港人治港」的原則，並且導致英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才使港人活躍起來，成立組黨以參與選舉，故中國因素才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根本因素。
- 再者，就影響力而言，中國因素的影響力遠遠大於香港因素，因中國因素可以直接干預香港政治的發展，例如中國不滿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結果，結果另組「臨時立法會」，並於回歸後取締了 1995 年該屆的議員，反映中國因素的影響力遠大於本地因素。

C. 中國因素 > 國際因素(非殖民地化浪潮的影響)

- 就影響力而言，雖然二次大戰後的非殖民地化浪潮使港英政府提高本地華人在立法及行政兩局的參與，但轉變的規模較小，反之，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六七暴動則使港英政府需要大量吸納華人進入政府，並且進行大規模的民生改革，包括住屋、教育等方面，故中國因素的影響力更大。
- 就時間的持續性而言，非殖民地化浪潮的影響力主要是在 1950-60 年代，但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則是持續半個世紀，19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港英政府需要推行改革以減低市民的不滿，抗衡共產主義的發展。至 1980 年代後，隨著香港將會在 1997 年回歸中國，中國的影響更與日俱增。

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因素 - 其他因素

A. 英國因素：英國政府直接影響香港政治的發展

於 1997 年回歸前，英國政府對於香港擁有全權的決策權，其取向直接影響著香港的政治發展，例如在 1970 年代以前限制華人晉身司級官員及華人的投票權，後來才改變取態，於 1980 年代起推行司級官員華人化，使愈來愈多華人獲委任司級官員，如陳方安生於 1993 年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及曾蔭權於 1995 年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此外，港英政府於 1980 年代開始積極開展代議政治改革，包括逐步減少立法局的官守議員人數及增加民選議員人數。更甚，英國政府更准許港督彭定康革新立法局，把 1995 年立法局全數 60 席改由選舉產生，大大提高了立法局的代表性，可見英國政府對於香港政治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力。

B. 本地因素

BI. 人口劇增

二次大戰後，戰後的嬰兒潮及難民潮使香港人口劇增，1950 年的香港人口已超過 200 萬。人口的劇增使港英政府需要成立更多行政機構及聘請更多公務員，以協助管治香港。因此，1950 年代起大量行政機構湧現，包括社會福利署(1958 年)、新聞處(1959 年)等，同時也聘請大量華人任職公務員，令華人公務員人數由 1952 年時的約 2.3 萬人倍增至 1962 年時的約 4.8 萬人。及後，人口進一步增長，1965 年時人口已增加達 370 萬人，令社會對於資源、福利等的需求大增，促使政府需要推行更全面的政治及社會改革，以滿足人口需求，如 1972 年宣布推出「十年建屋計劃」以協助低收入家庭解決住屋問題；1973 年提出的公共援助計劃以援助經濟上無法達到自給自足的市民，使港英政府在政策上日益重視民生。

BII. 資產及中產階級的崛起

經濟及教育的發展衍生出一批少數的華人精英及商人，例如何東、周壽臣等，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龐大，有助政府管治人民，其中周壽臣在 1925-26 年的省港大罷工中擔當重要的斡旋角色，穿梭中港兩地，協調港英政府與中國廣州政府的分歧，使其於 1926 年獲委任為首位行政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此外，隨著二次大戰後香港經濟的起飛和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湧現，他們政治意識較強，在滿足經濟利益後進一步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成為香港政治的新勢力，其中在 1980 年代起，更開始透過建立政黨的方式進入議會，如成立匯點(1983)、港同盟(1990)等，成為 20 世紀末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BIII. 港人的訴求

港人對於政府的不滿也成為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例如在 1967 年的六七暴動反映港人極度不滿港英政府的管治，令港英政府知道需要吸納更多華人進入政府，並且建立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例如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減低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此外，於香港回歸的過渡期內，港人希望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故積極組織政黨，參與立法會選舉，如李柱銘、司徒華等創立港同盟(1990)等，成為推動香港政治發展的一股重要勢力。

C. 國際因素

CI. 日本的入侵

日本對香港的入侵中斷了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由於日軍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進攻香港，並於同月 25 號成功打敗英國駐港軍隊，港督楊慕奇宣佈投降，香港正式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日本於佔領香港後，隨即擱置了原有行政、立法及市政三局的工作，並成立「軍政廳」(1941)以實施軍法管治，隨後亦於 1942 年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以取替「軍政廳」，成為香港最高機構，下設民治部、財政部、經濟部及外事部等部門以負責各項工作。此外，日軍為方便對香港進行軍法管治，把香港劃分為「三所二十八區」，這成為日後香港劃分成十八區的基礎，有助地區政治的發展。

CII. 非殖民地化浪潮的影響

二次大戰後，隨著英、法等殖民地帝國的衰落和殖民地國家要求獨立的呼聲日高，世界各地均捲入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非殖民地化浪潮，許多國家實現自治，脫離宗主國的控制而獲得獨立，例如菲律賓及緬甸分別於 1946 年及 1948 年獲得獨立。由於港英政府是以殖民地統治者的身份管治香港，非殖民地化浪潮使港人萌生獨立的念頭，並且更容易對港英政府的統治產生不滿。為此，港英政府需要推行政治改革以緩和港人的不滿，包括逐步放寬華人進入行政及立法兩局，以籠絡華人精英協助管治香港，使行政及立法兩局的華人議員由 1962 年的分別 3 人和 5 人，增至 1966 年的 11 人和 10 人，使更多的華人能夠參與香港政治。

香港政治的發展

1. 第一階段：二十世紀初英國統治時期(1900-41)

A. 該階段的概況

AI.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

華人精英進入行政及立法兩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透過委任華人精英進入政府以加強對港人的管治 ◇ 例如 1926 年委任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發揮著重要斡旋角色的周壽臣為首位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 ◇ 例如 1914 年委任韋玉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市政局的成立 (193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36 年將「潔淨局」改組為「市政局」 ◇ 負責市區的衛生工作 ◇ 是香港首個有民選議員參與決策的機構 (1946 年顏成坤成為首位市政局華人議員)

AII.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AIII. 公務員本地化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AIV. 華人團體

華人社團的重要性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就地區事務諮詢華人社團的意見 ◇ 例如政府於 1926 年成立新界鄉議局以作為政府與新界居民溝通的橋樑 ◇ 其他華人組織，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等也是政府的諮詢機構之一
------------	---

AV. 民生政策

歧視華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例如香港作為華人社區，但只有英文是作為官方語言 ◇ 例如 1904 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禁止華人在山頂居住
不干預華人習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例如新界地區在農曆新年期間的放鞭炮活動

B. 該階段出現轉變的原因

中國因素 (廣州政府的影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0 世紀初香港低下階層生活困苦 ◇ 廣州政府(孫中山)的支持下，低下階層發起多次罷工 ◇ 其中包括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及 1925 年的省港大罷工
英國因素 (新界納入英國 管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使界限街以北的地區納入英國的管治範圍 ◇ 新界原居民對港英政府的管治較為反感，例如政府於 1923 年宣佈新界居民在農田上建屋需要補回地價，隨即就引起新界居民的強烈反抗 ◇ 因此政府需要採取間接的管治政策，利用華人領袖或華人社團協助管治 ◇ 其中包括於 1926 年成立新界鄉議局以作為政府與新界居民溝通的橋樑
本地因素 (華人精英的崛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經濟及教育的發展衍生出一批少數的華人精英及商人 ◇ 例如何東、周壽臣等，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龐大，有助政府管治人民 ◇ 其中周壽臣在 1925-26 年的省港大罷工中擔當重要的斡旋角色，穿梭中港兩地，協調港英政府與中國廣州政府的分歧，使其於 1926 年獲委任為首位行政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
國際因素	\

C. 該階段的特徵

政府以行政為主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政府施政以行政機構為主導 由以港督為首的布政司署制訂及提出各項政策及法案
港督為權力核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及《殖民地規例》均賦予了總督擁有在香港的最高決策權 統領布政司署、行政及立法兩局，擁有委任及罷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權力 擁有司法、軍事及外事權
行政、立法兩局配合政府施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行政、立法兩局負責輔助港督施政 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等主要官員是兩局的當然議員 立法、行政兩局的議員大多相同 變相兩局的職責是通過政府的決策
欠缺選舉成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港督委任或罷任 只有 1936 年成立的市政局才有民選議席，但 13 個議席僅有 2 個議席是經由選舉產生
對華人採取間接管治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為避免引起華人的不滿，政府透過華人社團或少數華人精英以協助管治 例如新界鄉議局(1926)作為政府與新界居民溝通的橋樑 例如在平息省港大罷工一事上發揮重要角色的周壽臣被委任為行政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1926)
不干涉華人習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為避免文化衝突，政府甚少干涉本地華人的生活習俗 例如新界地區在農曆新年期間的放鞭炮活動
歧視華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華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 例如 1904 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禁止華人在山頂居住 例如香港作為華人社區，但只有英文是作為官方語言

2. 第二階段：日治時期(1941-45)

A. 該階段的概況

AI.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及地區議會與制度

原有機關停止運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41 年 12 月港督楊慕奇向日軍投降後，日本接管香港，擱置了原有行政局、立法局及市政局等原有港英政府機關的工作
成立總督部 (194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41 年 12 月成立「軍政廳」，以實施軍法管治 ◇ 於 1942 年 2 月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以取替「軍政廳」 ◇ 是日治時期香港的最高機構 ◇ 下設民治部、財政部、經濟部及外事部等部門以負責各項工作
實行分區制度 (194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把香港劃分成「三所二十八區」 ◇ 「三所」指於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成立「地區事務所」 ◇ 「二十八區」指「三所」之下再劃分為「二十八區」，每區設「區政所」

AII.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AIII. 公務員本地化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AIV. 華人團體

成立「兩華會」 (194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42 年 1 月成立了「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 ◇ 再於 1942 年改組為「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兩華會」，由華人多任兩會委員 ◇ 作為諮詢機關，並負責地區事務 ◇ 落實「以華制華」的管治方針，藉籠絡華人領袖以減低華人的不滿
-------------------	--

AV. 民生政策(壓抑民生)

糧食配給政策	◇ 實行糧食配給，每人每天從「區政所」領票以購買少量糧食
歸鄉政策	◇ 於 1942 年推行歸鄉政策，遣返港人回鄉

B. 該階段出現轉變的原因

中國因素	\
英國因素 (英國戰敗)	◇ 日本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進攻香港，英國駐港軍隊於奮戰 17 日後，由港督楊慕奇宣佈投降，正式中止了英國對香港的管治
本地因素	\
國際因素 (日本的入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襲美國珍珠港後，翌日隨即進攻香港 ◇ 香港於不足 1 個月內淪陷，港督楊慕琦於 12 月 25 日向日軍投降 ◇ 香港正式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C. 該階段的特徵

軍事考慮為優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優先考慮軍事策略 ◇ 例如實行糧食配給政策，憑證購糧，並且推行歸鄉政策，以防止國民黨及共產黨黨員在港建立勢力
嚴厲管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治時期，日本對香港進行嚴厲管治 ◇ 例如實行糧食配給政策，每人每天從「區政所」領票以購買少量糧食 ◇ 例如於 1942 年推行歸鄉政策，遣返港人回鄉 ◇ 例如於 1943 年規定軍票為唯一的交易貨幣
分區管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實行「三所二十八區」的制度 ◇ 每所設一「地區事務所」；每區設一「區政所」 ◇ 成為日後香港地區行政的參考
以華制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利用「兩華會」實行以華制華的政策 ◇ 由羅旭龢和周壽臣擔任兩會主席 ◇ 允許華人參與地區事務，以進行間接統治
日化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政府推行日化政策以同化港人 ◇ 例如日語取替英語成為官方語言 ◇ 例如學校被規定教授日語及日本文化

3. 第三階段：戰後政治及制度的轉變(1945-67)

A. 該階段的概況

AI.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及地區議會與制度

楊慕琦計劃 (194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楊慕琦於 1946 年發表政治改革方案 ✧ 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 ✧ 主張成立一個由 2/3 議席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市議會 ✧ 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議席，使非官守議員成為局內的大多數 ✧ 目的是推動香港的民主化及本地化 ✧ 隨著楊慕琦任滿離職及共產中國的建立，計劃胎死腹中
立法、行政、市政三局 代表性的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減少立法、行政、市政三局的官守議員議席，並增加非官守議員議席 ✧ 例如在 1948-51 年間，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由 4 名增加至 6 名，官守議員則由 7 名減至 6 名 ✧ 例如在 1948-51 年間，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由 1 名增加至 8 名，官守議員則維持 9 名不變。 ✧ 例如在 1953-56 年間，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人數由 4 名增加至 8 名
強化與市民的溝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於 1963 年成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以促進兩局非官守議員與市民的溝通 ✧ 自 1960 年代起廣設不同類型的諮詢組織，至 1962 年時已多達 67 個

AII.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行政機構的擴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於 1950 年末起設立了大量的行政機構 ◇ 例如社會福利署(1958 年)、新聞處(1959 年)、人民入境事務處(1961 年)、運輸署(1965 年)、法律援助署(1967 年)
---------	---

AIII. 公務員本地化

聘請更多公務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愈來愈多的華人獲聘請為公務員 ◇ 例如於 1952 年時有 22,900 名公務員為華人，佔整體的 95.56%，至 1962 年時人數增加至 48,277 名(佔 96.74%)
華人政務官的出現及增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政務官人數也劇增 ◇ 例如 1948 年徐家祥成為了首位華人政務官，至 1962 年華人政務官人數已增至 12 人，佔整體政務官人數約 15% ◇ 例如陳方安生於 1962 年任職政務官

AIV. 華人團體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AV. 民生政策

沒有顯著的變化	\
---------	---

B. 該階段出現轉變的原因

中國因素 (共產中國的建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港英政府恐懼共產思想會在香港擴散 ◇ 令楊慕琦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英國因素 (港英政府重掌政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二次大戰結束前，英國政府曾承諾戰後提高殖民地國家的自治權 ◇ 因此在 1945 年日本投降，港英政府重新掌管香港後就開展了「楊慕琦計劃」
本地因素	人口劇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二次大戰後，戰後的嬰兒潮及難民潮使香港人口劇增，1950 年的香港人口已超過 200 萬 ◇ 政府需要成立更多行政機構及聘請更多公務員以滿足社會需求
	中產階級的崛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經濟及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使中產階級出現 ◇ 他們政治意識較強，在滿足經濟利益後進一步要求分享政治權力
(非殖民地浪潮) 國際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均捲入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非殖民地化浪潮 ◇ 由於港英政府是以殖民地統治者的身份管治香港，因此需要進行改革以緩和港人的不滿

C. 該階段的特徵

官守議席的減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行政局、立法局及市政局的官守議席逐步減少 ✧ 例如在 1948-51 年間，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由 4 名增加至 6 名，官守議員則由 7 名減至 6 名
華人地位不斷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參政的人數及層面不斷增加及提高 ✧ 更多的華人進入行政、立法兩局
公務員本地化的擴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公務員的比例及人數增加 ✧ 至 1962 年已有達 96.74%的公務員是華人
行政機構的湧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為應付與人俱增的人口，政府增設了許多行政機構 ✧ 例如社會福利署(1958 年)、新聞處(1959 年)、入境處(1961 年)、運輸署(1965 年)、法律援助署(1967 年)

4. 第四階段：改革層面的擴展(1967-84)

A. 該階段的概況

AI.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及地區議會與制度

立法、行政、市政三局 代表性的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立法、行政、市政三局的議席人數提高，其中華人的參與更日益擴增 ◇ 例如立法局方面，1966-74 年間立法局華人議員人數由 10 人增至 23 人 ◇ 例如行政局方面，1966-74 年間行政局華人議員人數由 11 人增至 19 人 ◇ 例如政府於 1973 年廢除所有市政局的官守議席
民政主任計劃(1968) 民政司署(1969) 政務總署(198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 ◇ 於 1969 年革新華民政務司署，改組為「民政司署」，負責管理各區的民政處 ◇ 於 1981 年成立政務總署，負責管理各區的政務處
區議會 (198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把全港劃分為 18 區，每區設一區議會，部分區議員由人民所選出 ◇ 首次區議會選舉於 1982 年舉行 ◇ 21 歲或以上並同時在港住滿 7 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投票權

AII.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成立廉政公署 (197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71 年已通過新的《防止賄賂條例》，凡政府官員的財富與薪酬不相稱而未有合理解釋，則屬違法 ◇ 於 1974 年成立廉政公署以負責打擊貪污 ◇ 直接向港督負責，擁有高度自主及獨立性
成立法定公營機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為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政府成立各類型法定公營機構以負責不同工作 ◇ 例如消費者委員會(1974)、九廣鐵路公司(1982)等

AIII. 公務員本地化

聘請更多公務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愈來愈多的華人獲聘請為公務員 ◇ 例如於 1972 年時有 88,121 名公務員為華人，至 1980 年時人數增加至 124,950 名
華人政務官的增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68 年時，華人政務官人數只有 23 人，佔整體政務官人數的約 23%，但至 1978 年時已增加至 91 人，佔約 44% ◇ 例如曾蔭權、林鄭月娥及曾俊華分別於 1971 年、1980 年及 1982 年成為政務官

AIV. 華人團體

沒有顯著的變化	◇ 匯點(1983)
---------	------------

AV. 民生政策

社會福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發表《社會福利在香港的前景》(1973)及《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1979) ◇ 提供援助予弱勢社群，例如是貧困人士、傷殘人士、失業者及老人等 ◇ 其中 1973 年提出的公共援助計劃便是「綜援」的前身
房屋計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72 年宣布推出「十年建屋計劃」，計劃在 1973-82 年間興建大量公共屋邨予 180 萬香港居民 ◇ 1973 年成立房委會以制訂及推行公共房屋計劃 ◇ 1976 年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提供低於市價的房屋單位
普及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71 年推行 6 年免費教育，為 6-12 歲的適齡兒童提供基礎教育 ◇ 於 1978 年推行 9 年免費教育，將義務教育擴展至初中

AVI. 其他

中文成為法定語言 (197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74 年修訂《法定語文條例》，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 ◇ 方便政府諮詢民眾的意見
--------------------	---

B. 該階段出現轉變的原因

中國因素 (文革的影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六七暴動受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出現 ◇ 為了減低共產主義在香港的影響力，政府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
英國因素		\
本地因素	人口劇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人口於二次大戰後持續增長，1965 年的香港人口已達 370 萬 ◇ 人口增長令社會對於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及醫院等方面的需求大大提昇 ◇ 政府需要推行更全面的政治及社會改革，以滿足人口需求
	中產階級的湧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經濟及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使中產階級湧現 ◇ 他們政治意識較強，在滿足經濟利益後進一步要求分享政治權力
	示威暴動浪潮的啟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經濟於 1950-60 年代發展蓬勃，但大眾生活仍然困苦 ◇ 六七暴動揭示低下階層對於未能受惠於經濟發展的不滿 ◇ 為了平息社會的不滿及動盪，政府開放更多渠道與市民溝通，並大力推行改善民生的措施
	政府部門的不協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戰後政府架構急速擴展，不但使部門之間容易出現不協調情況，減慢行政效率，更加重了財政負擔 ◇ 因此，政府需要成立更多的公營機構，以提高效率及減低成本
國際因素 (非殖民地浪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均捲入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非殖民地化浪潮 ◇ 由於港英政府以殖民地統治者的身份管治香港，因此需要進行改革以緩和港人的不滿

C. 該階段的特徵

官守議席的減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行政局、立法局及市政局的官守議席逐步減少 ◇ 其中市政局的官守議席於 1973 年全數廢除
華人地位不斷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參政的人數及層面不斷增加及提高 ◇ 更多的華人進入行政、立法兩局 ◇ 更多的華人成為政務官
公務員本地化的擴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公務員的比例及人數增加 ◇ 至 1980 年已有達 97.61%的公務員是華人 ◇ 華人政務官的比例及人數激增 ◇ 至 1978 年時已增加至 91 人，佔整體政務官人數的約 44%
市民參與度的提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區議會成立及革新市政局和立法局後，市民的投票權獲得大大提昇 ◇ 例如 1982 年區議會選舉准許 21 歲或以上並同時在港住滿 7 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投票權
公共服務的全面發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人口劇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急速擴展 ◇ 例如成立大量法定公營機構，包括消費者委員會(1974)、九廣鐵路公司(1982)等 ◇ 又提供大量社會福利，例如九年免費教育(1978)、公共援助計劃(1973)等

5. 第五階段：代議政制的發展(1984-97)

A. 該階段的概況

AI. 行政、立法、市政三局及地區議會與制度

立法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5 年舉行首次間接選舉，56 名議員當中，有 24 名由選舉團及功能組別選出 ◇ 1991 年舉行首次直接選舉，18 名議員由地方選區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 ◇ 1992 年，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革新立法局，推動民主化進程 ◇ 1993 年，立法局主席改由議員互選產生，而非港督出任 ◇ 1995 年，立法局全部 60 席均改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直通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5 年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原本可以坐「直通車」過渡至回歸後 ◇ 但由於中國認為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未有經過中、英雙方的同意，有違《基本法》，因此於 1996 年另組「臨時立法會」 ◇ 於回歸後取替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議員，使部分議員被迫「下車」
區議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5 年取消全部的官守議席 ◇ 1994 年取消全部的委任議席，並將選民資格由 21 歲調停至 18 歲
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3 年舉行首次市政局直選 ◇ 1986 年在新界地區設立區域市政局，負責文娛康樂和公共衛生等工作，部分議員經分區直選的方式選出 ◇ 1995 年取消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內的全部委任議席

AII. 一般行政機構及公營機構

成立法定公營機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 1980 年代金融業的發展，政府開始成立有關金融業方面的公營機構，以維持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 例如證監會(1989)、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1997)等
----------	---

AIII. 公務員本地化

聘請更多公務員	◇ 人數由 1980 年的 123,950 人(佔整體的 97.61%)增加至 1990 年的 188,393 人(佔整體的 98.68%)
華人政務官的增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港英政府於 1970 年代末開始大幅增加政務官的人數，以及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 ◇ 愈來愈多華人獲委任為政務官 ◇ 例如黃偉綸及譚志源分別於 1985 年及 1987 年獲任為政務官
司級官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港人治港」方針的落實，愈來愈多華人出任部門首長甚至司級官員 ◇ 例如李君夏於 1989 年出任警務處處長 ◇ 例如陳方安生於 1993 年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 ◇ 例如曾蔭權於 1995 年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

AIV. 華人團體

政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代議政制的開展，華人開始組織政黨以參與政治，競逐立法局、區議會、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民選議席 ◇ 例如香港民主同盟(1990)、民主建港協進聯盟(1992)、自由黨(1993)及民主黨(1994)等
----	--

AV. 民生政策

社會福利	◇ 於 1993 年將「公共援助計劃」更改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為經濟未能夠達到自給自足的香港居民提供援助
------	--

B. 該階段出現轉變的原因

中國因素	六四事件的影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使英國恐懼香港會受到中國的高壓統治 ✧ 因此使英國加快香港的民主化建設，港督彭定康更於 1995 年落實立法局全部議席均由選舉產生
	中國支持親中派別的发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因民建聯及工聯會等建制派獲得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在中國 1996 年籌組的「臨時立法會」中，建制派便佔了大多數，更成為了首屆回歸後的立法局議員
英國因素 (加強香港的民主成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由於中、英已於 1984 年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 ✧ 港英政府於是加快香港民主化的進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奠定香港的民主根基
本地因素	中產階級的湧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產階級的崛起及知識分子的湧現成為香港政治的新勢力，他們渴望參與政治，投身政府 ✧ 在 1980 年代，他們透過組織政黨，參加議會選舉，從而影響香港政治的發展
	港人的訴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香港回歸的過渡期內，港人希望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故積極組織政黨，參與立法局選舉，如李柱銘、司徒華等創立港同盟(1990)等，成為推動香港政治發展的一股重要勢力
國際因素		\

C. 該階段的特徵

代議政制的擴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立法局、區議會、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官守和委任議席逐步取消 ✧ 民選的議席及比例不斷增加 ✧ 1995 年，立法局的全部議席更由選舉產生
華人地位不斷提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參政的人數及層面不斷增加及提高 ✧ 不但更多華人進入行政、立法兩局 ✧ 至 20 世紀末，愈來愈多的華人獲委任為司級官員
公務員本地化的擴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人公務員的比例及人數不斷提高 ✧ 至 1990 年已有達 98.68%的公務員是華人 ✧ 愈來愈多華人出任部門首長甚至司級官員 ✧ 例如陳方安生及曾蔭權
政黨政治愈趨成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黨發展起來以參加選舉，更組成聯合力量 ✧ 例如匯點與香港民主同盟於 1994 年合併為民主黨 ✧ 工會組織也轉化為政黨，例如工聯會及職工盟等
市民參與度的提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於 1994 年區議會選舉將合資格選民年齡由 21 歲調低至 18 歲 ✧ 更多的市民能夠擁有投票權

大事年曆表

年份	事件
1880 年	伍廷芳成為立法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1904 年	《山頂區保留條例》
1914 年	韋玉成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1922 年	海員大罷工
1925-26 年	省港大罷工
1926 年	周壽臣成為行政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新界鄉議局成立
1936 年	潔淨局改組為市政局
1941 年	日本佔領香港，港英政府宣佈投降
	成立軍政廳
1942 年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
	成立區政所
	成立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
	成立兩華會
1946 年	楊慕琦計劃
	顏成坤成為首位市政局華人議員
1948 年	徐家祥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
1958 年	成立社會福利署
1959 年	成立新聞處
1961 年	成立人民入境事務處
1963 年	成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
1965 年	成立運輸署
1967 年	六七暴動
	成立法律援助署
1968 年	民政主任計劃
1971 年	《防止賄賂條例》

1972 年	十年建屋計劃
1973 年	《社會福利在香港的前景》
	公共援助計劃
	成立房委會
1974 年	成立廉政公署
	成立消費者委員會
	《法定語文條例》
1976 年	居者有其屋計劃
1978 年	九年強制教育
1979 年	《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
1981 年	政務總署成立
1982 年	首屆區議會選舉
	九廣鐵路公司成立
1983 年	匯點(政黨)成立
1984 年	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1986 年	成立區域市政局
1989 年	中國六四事件
	李君夏出任警務處處長
1990 年	港同盟(政黨)成立
1992 年	民建聯(政黨)成立
1993 年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陳方安生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
	自由黨(政黨)成立
1994 年	民主黨 (政黨)成立
1995 年	立法局全數 60 席由選舉產生
	曾蔭權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
	黎慶寧出任保安司
1996 年	中國單方面另組臨時立法會
1997 年	香港回歸中國

最強

K. W. Ho 在難度最高的高考歷史科中以 88% 之求敗分數奪 A
歡迎其他大型補習社之 A 級導師挑戰，
本人先讓 20% 分數（約 4-5 個等級）
即使放眼 5** cut off 高達近 80% 分數的 DSE 亦無可超越！

最多

2015-2021 年間教出超過 120 位 DSE 歷史科 5** 門生
其中 2017 年 DSE 歷史科中每 2.7 位 5** 學生
就有一位是 K. W. Ho 門生
戰績無可匹敵，大幅拋離所有歷史科補習導師！

最神

連續 9 年教出新修生（由零開始以不足十個月時間
應戰 DSE）至少獲取 5* 成績
2016 年更有新修學生奪得 5** 成績，創造新修傳奇
2017 年有重考學生由 Level 2 重考躍升至 5**，
創造重考傳奇
（上述學生全部報讀 K. W. Ho 起碼 8 期課程）

最平

每堂低至 \$75
孖住報每期平一半學費（每堂平 \$37.5）
5** 獎學金回饋課程原價之一半學費（每堂回饋 \$37.5）
最盡可以達致 \$0 補習

最方便

以 Online Lesson 形式隨時、隨地上課，
節省交通時間
更有電子版筆記，溫書最方便！

最彈性

課堂進度任由你安排
鐘意上邊個課題就上邊個課題
鐘意幾時上就幾時上
* 大滿貫優惠更可在考 2022 年 DSE 前無限
任 Loop 報讀之所有課堂

最全面

筆記總頁數超過 8000 頁
涵蓋課文、史實、概念、技巧、海量練習
及範文、精讀、考卷
配套無可匹敵

最合適

如果你本來已經使用 K. W. Ho 免費版 Unbeatable Notes
K. W. Ho 將會是你唯一的歷史科補習選擇
聚焦教授課題重點、必學技巧，避過筆記伏位
最短時間助你最有效使用數千頁 Unbeatable Notes 筆記
慳時間，就是補習的最主要原因！

新高中歷屆試題出題趨勢

	資料題	論述題
SP	\	<p>Q1. 到了 2000 年，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狀況在什麼程度上實現了現代化？試以 1970-90 年代的香港歷史，加以解釋。</p> <p>Q7. 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例，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哪些方面是該國家或地區於 20 世紀期間的一個轉捩點。</p>
PP	\	<p>Q7. 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例，討論該國家或地區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p>
12	\	<p>Q1. 「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持續增長。」試參考 1960-97 年間的歷史，評論此說能否成立。</p>
13	\	<p>Q1. 「中國因素是塑造 1980-2000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主要因素。」評論此說能否成立。</p>
14	\	<p>Q1. 探討香港政府如何處理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民眾移居香港和 1980-9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各種問題。</p>
15	\	<p>Q1. 追溯並解釋香港政治於 1950-97 年間的發展。</p>

16	\	Q1. 中國因素在什麼程度上影響了 1967-97 年間的香港政治發展？
17	第 1 題 香港前途問題是否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
18	第 1 題 你是否同意港英政府在 1967-97 年間顯示了其改善管治的能力	\
19	\	Q1. 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於 1967-97 年間在什麼程度上經歷了蛻變？
20	第 1 題 你是否同意 1951-1997 年，香港在民主和種族平等皆有改善	\

香港政治發展

細閱資料 A 及 B。

資料 A

下表節錄自香港某壓力團體於 1982 年就著香港前途問題所進行的意見調查，訪問受訪者對於 1997 年後香港狀況的期望。

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現狀	70%
成為託管領地*	15%
被中國收回並受中國管治	4%
以上皆非	2%
不知道	9%

*託管領地：由聯合國管理的非自治領地

資料 B

以下節錄自粵語歌手許冠傑於 1990 年所寫的歌曲《話知你 97》的歌詞。

我話知你九七
其實駛乜驚到求神又拜佛

咪匿响屋企速速 Call 機 Call 班知己 睇番齣無厘頭攪笑戲
卡拉 OK 隊樽拔蘭地 High High 咁 高聲亂唱 再去旺角打機
明日懶鬼理 最緊要依家 Happy 話知佢死

我話知你九七
其實香港適應力強未嚇窒
斷估或者到咗九七
繁榮盛世度度有金執

- (a) 參考資料 A，推斷香港人對香港前途問題的一項憂慮。 (3 分)
- (b) 參考資料 B，你在題(a)所指的憂慮在 1990 年時是否仍然存在？ (4 分)
- (c) 你是否同意香港前途問題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香港直至 1997 年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

(a) 參考資料 A，推斷香港人對香港前途問題的一項憂慮。

(3 分)

評分參考

憂慮

[1 分]

例： - 擔心中國會於 1997 年後收回香港

L1 能引用相關線索，但沒有恰當的解釋。

[最多 1 分]

L2 能引用相關線索，並作恰當的解釋。

[最多 2 分]

例： - 多達 70%受訪者期望「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現狀」，只有 4%受訪者期望「被中國收回並受中國管治」

參考答案

憂慮是擔心中國會於 1997 年後收回香港。

資料中多達 70%受訪者期望「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現狀」，反映大部分港人希望繼續維持現狀，不希望回歸到中國的管治，憂慮現況會有所改變。

僅有 4%受訪者期望「被中國收回並受中國管治」，反映只有極少數港人願意回歸到中國管治，大部分港人卻不願，可見港人擔憂香港會回歸到中國的管治之下。

(b) 參考資料 B，你在題(a)所指的憂慮在 1990 年時是否仍然存在？ (4 分)

評分參考

- L1 嘗試解釋，但對資料的詮釋薄弱或含混不清。 [最高 2 分]
L2 清楚解釋答案，並能有效運用資料。 [最高 4 分]

不再存在：

例： - 「我話知你九七 其實駛乜驚到求神又拜佛」、「明日懶鬼理 最緊要依家 Happy 話知佢死」、「斷估或者到咗九七 繁榮盛世度有金執」
流露出及時行樂，不用過度擔心的意思。

*觀乎資料，考生會認為憂慮不再存在。若考生持相反意見，只要言之成理，亦應酌量給分。

參考答案

該憂慮不再存在。

歌詞中「我話知你九七 其實駛乜驚到求神又拜佛」，反映出 1997 年回歸並非甚麼災難性的大事，所以無須擔心，認為不用擔心到求神拜佛，可見憂慮已不在。

歌詞中「明日懶鬼理 最緊要依家 Happy 話知佢死」，反映作者認為明日之事不用擔心過多，及時行樂最重要，可見憂慮已不在。

歌詞中「其實香港適應力強未嚇窒」，指出香港人擁有很強的適應能力，不用擔心回歸後帶來的轉變，認為香港人也必定能夠克服，可見憂慮已不在。

歌詞中「斷估或者到咗九七 繁榮盛世度有金執」反映出作者認為回歸後甚至會有好的機遇，遍地黃金，從其正面的思想可見憂慮不在。

(c) 你是否同意香港前途問題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香港直至 1997 年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評分參考

-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論及資料及相關史實。 [最多 2 分]
- L2 答案片面，僅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 [最多 4 分]
- L3 答案全面，能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 [最多 8 分]

同意：

- 例： - 壓力團體透過訪問形式收集市民意見，反映其關心香港的前途。(資料 A)
-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前，香港政黨政治並不活躍，但自前途問題出現後，許多人士組成政黨，參與香港政治。(就我所知)
- 前途問題出現後，不少藝術創作均與前途問題有關，反映港人關注香港政治。(就我所知)

不同意：

- 例： - 歌詞「明日懶鬼理 最緊要依家 Happy 話知佢死」反映港人並不關心回歸問題，反而注重及時行樂。(資料 B)

參考答案

我在大程度上同意此說。

在壓力團體方面，資料 A 是「香港某壓力團體所進行的一項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調查」，反映前途問題使壓力團體備受關注，更透過訪問方式希望收集更多港人意見，政治意識有所提高。

在港人反應方面，資料 A 中只有 9% 人對期望 1997 年後香港的狀況表示「不知道」，相反，多達 91% 受訪者均表達出其意願，反映前途問題使大多港人關注香港政治前景，表達己見，政治意識有所提高。

就我所知，流行文化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流行文化較少滲入政治意識，其中多以生活元素為主，例如歌詞《半斤八兩》(1976 年)講述打工仔生活，政治意識較低。

然而，至 1982 年前途問題起，創作人在流行文化中經常流露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感受，例如劉德華歌曲《中國人》希望加強香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可見前途問題令港人在流行文化中大量加入政治元素，政治意識大大提高。

在政黨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香港的政黨數目較少，而且工聯會等組織仍然未轉化為政黨，只為一社福組織，政治意識較低。

然而，至 1982 年前途問題後，港人積極組成政黨、壓力團體等，例如匯點(1983 年)、民建聯(1992 年)等，工聯會也由社福機構轉化為政黨參與選舉，可見前途問題使港人積極透過政治團體以參與香港政治，政治意識大大得到提高。

在投票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由於大部分港人沒有投票權後，故政治意識相對較低。

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出現，英國下放更多投票權予港人，使港人更加關注政治狀況，例如 1989 年六四事件令港人十分恐懼中國的管治，故於 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中踴躍投票予泛民陣營，以對抗親中勢力，結果使該年立法局選舉中 18 名民選議員多達 14 位是泛民人士。可見，前途問題使港人更加積極利用選票去影響香港政治，政治意識大大提高。

然而，小程度上可以反映港人的政治意識未有因前途問題而大幅提升。

參考資料 B，歌曲《話知你 97》的歌詞「明日懶鬼理 最緊要依家 Happy 話知佢死」，可見歌詞呼籲人民不用理會回歸問題，最重要是及時行樂，這是逃避面對前途問題，政治意識未有明顯提高。

總括而言，儘管部分情況反映出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未有因前途問題而提高，但整體而言，相比 1980 年前途問題前的情況，港人在 1980 年代後已經普遍具備政治意識，因此在大程度上同意題目。

細閱資料 A 和 B。

資料 A

以下是一本香港書籍對於《英皇制誥》的描述。

關於香港總督的權力，根據《英皇制誥》賦予總督具有指導香港一切政務的最高權力，由於總督是英女皇在香港的代表，所有軍事及民職人員必須向他效忠和服從。因此，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卸任後，以他的親身體驗作出總結，「在一個殖民地裡，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

再者，行政局也是根據《英皇制誥》的規定而成立。在《皇室訓令》中則指示香港總督在所有政事上，如非緊急、瑣碎或高度機密外，必須諮詢行政局的意見，但最後的決定權仍掌握在香港總督手裡。因此，行政局雖然是在香港政制中，根據有關規定而成立的最高行政機構，實際上它也只不過是香港總督最高權力下的一個諮詢機構。

資料 B

以下是一本香港書籍對於二十世紀初期在港的官學生的評論。

官學生計劃的原意是培育一群優秀政務官員，派往各地出任殖民地總督，他們卻「總是不太願意調職」。除了少數特別例子外，大部分官學生對本地華人漠不關心。…… 官學生人數雖少，也不該對香港鄰近國家發生的事情不聞不問。他們非但未有預計香港面對的新挑戰和威脅，相反，大部分官學生正沉醉於大英帝國太平盛世下的光輝。

在殖民地政府裡擔任決策工作的，大部分是這些閉關自守的官學生。正因為這樣，當香港首次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時[日本於 1941 年侵占香港]，他們的表現才會令居民大失所望。

- (a) 根據資料 A，指出《英皇制誥》中對於香港殖民地管治上的兩項權力安排。
(4 分)
- (b) 資料 B 作者對於官學生持什麼態度？試參考資料 B 的用語及論據，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 (c) 資料 A 及 B 能否充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特徵？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7 分)

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

(a) 根據資料 A，指出《英皇制誥》中對於香港殖民地管治上的兩項權力安排。

(2+2 分)

評分參考

L1 僅指出一項安排，能夠有效利用資料線索；或兩項安排，未能有效以資料支持。 [最多 2 分]

L2 指出兩項安排，能夠有效利用資料線索。 [最多 4 分]

例： - 賦予總督擁有最大的權力(「關於香港總督的權力，根據《英皇制誥》賦予總督具有指導香港一切政務的最高權力」)。
- 行政局實際的權力限於諮詢功能(「實際上它也只不過是香港總督最高權力下的一個諮詢機構」)。

參考答案

其一，《英皇制誥》賦予總督擁有最大的權力，因資料指出「總督具有指導香港一切政務的最高權力」，前總督葛量洪甚至形容「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可見《英皇制誥》賦予了總督擁有最大的權力。

其二，《英皇制誥》中，行政局名義上是最高行政機關，但實際上權力限於諮詢功能。資料指總督在大多事務上都必須諮詢行政局，然而最後的決策權仍掌握在總督之中，故行政局只是「總督最高權力下的一個諮詢機構」，可見行政局只具諮詢功能。

(b) 資料 B 作者對於官學生持什麼態度？試參考資料 B 的用語及論據，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評分參考

L1 答案含混，未能清晰指出作者的態度，及/或僅能按資料的用語或論據解釋答案。 [最多 2 分]

L2 答案清晰，能指出作者的態度，亦能按資料的用語及論據解釋答案。 [最多 4 分]

態度：

例：- 批評

用語：

例：- 「閉關自守」、「沉醉」。

論據：

例：- 官學生對華人及民生漠不關心，也對香港的鄰近的周遭形勢不聞不問。

- 於日本侵占香港時，官學生的表現令人失望。

參考答案

作者對官學生持批評、不滿等的負面態度

用語方面，作者以「閉關自守」形容官學生因循保守，不願接觸外界事物，可見作者批評官學生的負面態度。

而且，作者指官學生「沉醉於大英帝國太平盛世下的光輝」，諷刺官學生不思進取，沉迷於英國所帶予的榮譽感，可見作者的批評之意。

在論據方面而言。

作者指官學生對華人及民生「漠不關心」，也對香港的鄰近的周遭形勢「不聞不問」，有失作為日後管治階層應有的模樣，因此感到不滿。

此外，於日本侵占香港，香港面對首次「生死存亡的挑戰時」，官學生表現無能，令人感到失望，故對此感到不滿。

(c) 資料 A 及 B 能否充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特徵？試參考資料 A 及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7 分)

評分參考

- L1 答案片面(僅運用資料或相關史實)或持「充分」觀點。 [最多4分]
L2 能同時運用資料及相關史實；能清楚闡明觀點。 [最多7分]

資料：

- 例： - 總督是權力的核心，擁有最高權力。(資料 A)
- 行政局只具諮詢性質。(資料 A)
- 政務官[官學生]以至政府對於華人事務及民生漠不關心。(資料 B)

個人所知：

- 例： - 港英政府的管治特徵是以行政作為主導。
- 立法局也是輔助港督施政。
- 欠缺選舉成份。
- 以華人社團及華人精英協助管治香港。
- 政府甚少干涉本地華人的傳統習俗。
- 華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

參考答案

資料 A 及 B 不能充分反映二次大戰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特徵。

首先，資料 A 反映了總督是權力的核心，因《英皇制誥》賦予了「總督具有指導香港一切政務的最高權力」，可見總督是最高的決策者。

而且，資料 A 反映了行政局只具諮詢性質，因總督雖然在大多事務上都必須要諮詢行政局，但最後決策權卻在於總督之手，故沒有實質權力。

此外，資料 B 反映了官學生以至政府對華人事務及民生漠不關心，只是「沉醉於大英帝國太平盛世下的光輝」，可見政府對於華人事務甚少理會。

然而，資料存有頗多的局限。

其一，資料未有反映港英政府的管治特徵是以行政作為主導，由以港督為首的布政司署制訂及提出各項政策及法案。

其二，資料未有提及立法局也是輔助港督施政，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等主要官員是立法局的當然議員，變相協助政府通過決策。

其三，資料未提及當時香港政治欠缺選舉成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港督委任，只有 1936 年成立的市政局才有極少數的民選議席。

其四，資料未提及港英政府以華人社團及華人精英協助管治香港，例如鄉議局、周壽臣等，以協助港英政府與華人溝通。

其五，資料未提及政府甚少干涉本地華人的傳統習俗，例如新界地區在農曆新年期間的放鞭炮活動，使部分華人的傳統習俗得以保留。

其六，資料未提及華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例如 1904 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禁止華人在山頂居住，華人受到不公平對待。



細閱資料 A 及 B。

DBQ
#3

資料 A

以下漫畫出版自 1986 年的一份香港報章。漫畫右方的男子是當時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魯平，左方男子則代表香港人。



資料 B

以下是 1991 年首次透過直接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議員名單。

政治從屬	姓名
香港民主同盟 (港同盟)	陳偉業
	馮智活
	黃震遐
	林鉅成
	劉千石
	李柱銘
	李永達
	文世昌
	吳明欽
	司徒華
	涂謹申
	楊 森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民協)	馮檢基
匯點	李華明 狄志遠
穩定香港協會 (穩港協)	戴展華
無黨派	劉慧卿 黃宏發

* 港同盟與匯點於 1994 年合併，成為現今的民主黨

- (a) 參考資料 A，漫畫家對中國持什麼態度？解釋你的答案。 (4 分)
- (b) 參考資料顯示各議員的政治從屬，指出 1991 年立法局直選結果的一項特徵。 (3 分)
- (c) 資料 A 對於解釋資料 B 所示的 1991 年直選結果有何用處及局限？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參考答案

(a) 參考資料 A, 漫畫家對中國持什麼態度?

(4 分)

參考答案

漫畫家對中國持不滿、鄙視、諷刺等的負面態度。

其一，漫畫家將魯平描繪成一位「評判」，但魯平卻暗中阻止港人堆砌紙牌，實有失公允，抱有不滿。

其二，魯平於紙牌倒塌後露出奸狡的笑容，故諷刺魯平於破壞港人期望後沾沾自喜之舉，持諷刺的態度。

其三，圖中描繪港人希望實現港人治港的期望，但卻被中國官員愚弄，故感到不憤。

(b) 參考資料顯示各議員的政治從屬，指出 1991 年立法局直選結果的一項特徵。

(3 分)

參考答案

其特徵是大多數議員均來自民主派。

從資料中 18 名議員當中，有 12 名來自「港同盟」和 2 名來自「匯點」，可見民主派於直選中取得重大優勢，有超過 2/3 議員均來自民主派陣營。

(c) 資料 A 對於解釋資料 B 所示的 1991 年直選結果有何用處及局限？參考資料 A，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參考答案

資料 A 描繪作為「評判」的魯平暗中阻止港人堆砌紙牌，反映了港人懷疑北京政府推行「港人治港」的誠意，故希望透過選舉選出能代表港人期望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故使民主派於選舉中取得重大勝利。

資料 A 也反映了港人希望實現「港人治港」的訴求。資料可見港人正在堆砌「港人治港」的紙牌，正正基於港人希望落實「港人治港」，令立法局選舉所選出的都是華人議員。

然而，資料存有頗多的局限。

就我所知，資料未能反映民主派的政綱能回應港人訴求，如監察政府、要求平反「六四」等，均有助使民主派取得港人支持。

而且，1989 年的「六四事件」增加了港人對中國管治的憂慮，故認為政治民主化是保障前途的一個方法，支持民主派議員。

再者，隨著 1980 年代英國開始代議政制的改革，增加了港人的民主的認識和訴求，此等因素均有助主張民主的民主派議員得到港人的支持。

此外，由於中產階級的湧現，這些人士具有高的教育水平及熱衷參與政治，因此組成政黨，希望透過建立政黨力量以在選舉中取得優勢，所以大部分選出的議員當中都是屬於有黨派的人士。

格分法：

細閱資料 A 和 B。

DBQ

#4

資料 A

以下圖表展示 1952-90 年間香港華人與外籍公務員的人數及比例。

年份	華人公務員	外籍公務員
1952	22,900(95.56%)	1,063(4.44%)
1962	48,277(96.74%)	1,625(3.26%)
1972	88,121(97.88%)	1,905(2.12%)
1980	124,950(97.61%)	3,064(2.39%)
1988	182,843(98.56%)	2,640(1.44%)
1990	188,393(98.68%)	2,485(1.32%)

資料 B

下文取材自本地的一本歷史課本。

1920 年代以前，極少華人被委任為行政局、立法局議員，直至 1925-26 年後情況出現變化，總督金文泰為了鼓勵華人效忠政府和穩定政局，決定委任首位華人擔任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1926 年成立的新界鄉議局，其功能正是溝通新界官民，監察政府的土地政策、維護原居民的利益，以達到重視華人傳統的表現。

- (a)(i) 參考資料 A，描述 1952-90 年間香港公務員特徵的轉變。 (2 分)
- (a)(ii) 什麼因素導致了你在上題所描述的轉變？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 (a) 指出港英政府改善與本地華人關係的兩個方法。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2 分)
- (c) 就反映 20 世紀期間本地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而言，資料 A 和 B 有何用處及局限？試參考資料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參考答案

(a)(i) 參考資料 A，描述 1952-90 年間香港公務員特徵的轉變。 (2 分)

評分參考

- L1 能說明轉變，但未能恰當引用資料。 [最多 1 分]
L2 能說明轉變，能恰當引用資料。 [最多 2 分]

例： - 公務員總人數不斷上升。
- 華人公務員比例上升；外籍公務員比率下降。
- 於 1972-80 年間，華人公務員上升的比率倒退，反之，外籍公務員比率得到上升。

參考答案

首先，從資料可見公務員總人數不斷上升，由約 2.4 萬人增至約 19 萬人，升幅接近 8 倍。

其次，資料可見華人公務員比例上升，由 1952 年的 95.56% 增加至 1990 年的 98.68%，但外籍公務員的比率則下降，由 1952 年的 4.44% 下跌至 1990 年的 1.32%。

但值得注意的是，1972-80 年間，華人公務員上升的比率倒退，下跌 0.27%，反之，外籍公務員比率得到上升。

(a)(ii) 什麼因素導致了你在上題所描述的轉變？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3 分)

評分參考

- 例：
- 香港人口上升。
 - 非殖民地浪潮席捲全球。
 - 共產主義於中國建立政權。
 - 1960 年代的暴動。
 - 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

參考答案

其一，由於香港人口上升，令港英政府需要增加公務員人數，以協助管治香港。

其二，二次大戰後非殖民地浪潮席捲全球，港英政府聘請更多本地華人進入政府，以減低華人的不滿。

其三，1949 年共產主義於中國建立政權，使港英政府需要對華人採取拉攏的手段，以減低共產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力。

其四，1960 年代兩次大型暴動(1966 及 1967 年)使香港政府正視華人的訴求，聘請更多華人進入政府，以減低人民的不滿。

其五，由於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為貫徹落實「港人治港」的原則，故聘請更多華人進入政府。

(b) 指出英政府改善與本地華人關係的兩個方法。參考資料 B，解釋你的答案。

(2 分)

評分參考

- 例： - 委任華人進入行政局。 [1+1 分]
- 透過新界鄉議局與原居民溝通。

參考答案

其一，透過委任華人進入行政局以改善與本地華人的關係。資料指政府委任了首位華人擔任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從而使華人效忠及穩定政局。

其二，透過新界鄉議局與原居民溝通以改善與華人的關係。資料指鄉議局成立的功能「是溝通新界官民」，表現出政府重視華人傳統，從而改善與華人的關係。

- (c) 就反映 20 世紀期間本地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而言，資料 A 和 B 有何用處及局限？試參考資料 A 和 B，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評分參考

- L1 片面：僅討論資料的用處或局限。 [最多 4 分]
L2 全面：涵蓋用處和局限。 [最多 8 分]

用處

- 例： - 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資料 A)。
- 華人議員進入行政局(資料 B)。
- 鄉議局作為政府與華人溝通的橋樑(資料 B)。

局限

- 例： - 缺乏具體例子，如周壽臣於 1926 年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徐家祥於 1948 年受委任為政務官等。
- 華人對於立法局、市政局的參與也日益提高。
- 除了鄉議局外，保良局、東華三院也是港英政府與華人溝通的橋樑。
- 華人政黨於 1980 年代興起並參與區議會、立法局選舉。
- 高級公務員本地化，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

參考答案

首先，資料 A 反映了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華人公務員人數比例由 1952 年的 95.56% 增加至 1990 年的 98.68%，人數已達 18.8 萬人，可見本地華人對政府的參與度大大提高。

其次，資料 B 指出 1925-26 年時港英政府「委任首位華人擔任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顯示華人對香港政治的參與在 1920 年代得到提升，開始有華人進入行政局參與對香港的管治。

而且，資料 B 指出 1926 年成立了新界鄉議局，以達致「溝通新界官民」之效，可見政府對華人的重視程度得到提高，華人的意見也日益重要。

然而，資料也存有局限。

其一，資料缺乏具體的例子，如周壽臣於 1926 年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徐家祥於 1948 年受委任為政務官等，這都是資料並未提及的。

其二，資料指出華人對於行政局的參與，但卻並未提及華人對於立法局、市政局的參與也日益提高，至 20 世紀末，大部分的立法局及市政局的議員均是華人。

其三，除了鄉議局外，保良局、東華三院也是港英政府與華人溝通的橋樑，這均是資料未有提及的。

其四，資料並未提及華人政黨於 1980 年代的興起並參與區議會、立法局選舉，包括港同盟、匯點、民建聯等。

其五，資料只提及整體公務員的情況，但未有仔細談及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於 1993 年及 1995 年成為布政司及財政司。

格分法：

(a) 推斷香港政治制度的兩項特徵。(4 分)

參考答案

特徵一是立法局由外籍人士壟斷。27 位立法局成員中僅得 5 人是華人，其餘 22 位均不是華裔，可見外籍人士主導了立法局運作，華人在立法局的重要性有限。

特徵二是港督擁有極大的權力。資料中，港督葛量洪擔任了立法局主席一職，而且其餘所有立法局議員均由港督委任，可見港督權力極大，完全操控了立法局的運作及議員的組成，權力超然。

特徵三是行政主導。資料中，27 位立法局成員中有 18 名議員均是政府官員(主席和官守議員)，僅得 9 人是非官守議員。換言之，立法局是配合政府通過政策，不能妨礙政府施政，具有行政主導的特徵。

(b) 參考第一段，指出並解釋一個行政問題。(3 分)

參考答案

行政問題是警隊與律政署存在溝通上的語言問題。

資料指警隊一直敦促政府「聘用一名通曉中英文的華人檢察官，以便與律政署建立更好的相互了解和工作關係」，可見當時警隊由於語言問題，以致未能與律政署進行良好的溝通，使檢控工作出現困難。

資料又指「警員向不懂中文的律政署人員解釋案件方面的工作量」，反映當時律政署人員由於大多是外籍人士，語言不通，以致警員未能有效報告案件細節，拖延了檢控程序。

(c) 你是否同意 1951-1997 年，香港在民主和種族平等皆有改善？[S+K](8 分)

參考答案

我同意此說。

民主進程印證了此說。

參考資料 A，立法局方面，1951 年立法局除主席外的 26 位議員全部都由港督委任，而且非官守議員僅佔 9/27 人位。可見當時立法局沒有任何民選成份，而且由政府官員主導立法局，民主程度十分低。

然而，就我所知，港英政府在 1985 年在立法局引入首次選舉，其後彭定康更將 1995 年的 60 席立法局議員全數改由選舉產生，同時取消了官守議席，立法局主席之職亦改由議員互選產生。可見，至 20 世紀末，立法局出現了蛻變，民選成份大增，比起 1950 年代的情況大為改善。

地區制度方面，儘管市政局在 1936 年已經在市政局引入選舉，但民選成份很低，而且主要工作是城市清潔衛生，並非廣泛諮議民意及具代表性的機構。可見，在 1950 年代時，香港的地區制度是缺乏民主性的，地區欠缺民意代表。

然而，港英政府在 1968 年引入「民政主任計劃」，在港九劃分十區，設立民政署收集民意。及後更於 1982 年進行首次區議會選舉，讓市民選出地區的民意代表。可見，地區制度亦引入了民主成份，使人民能夠選出區議員去處理地區工作，民主情況大大改善。

種族情況也印證了此說。

參考資料 B，官員福利方面，1950 年代時華人的工作待遇均不平等。資料指「政府住房是所有海外僱員聘用條件的眾多顯著特點之一」，但當時的華人官員卻「沒有任何政府住房、房屋津貼、有薪長假等」。可見，外籍官人有著優好的住屋津貼和福利，但本地華人官員均卻不能享用，此是種族歧視，當時情況並不平等。

就我所知，至 1997 年時，華人官員也逐步享有海外官員的員工福利，包括住屋、醫療等，政府工更被視為是「鐵飯碗」，是許多本地華人所嚮往的工作。可見，官員的福利在 20 世紀末時大為改善，大致與海外僱員看齊。

語言方面，1950 年代時港英政府仍然忽視中文的重要性，官方語言只有英文。然而，華人在社會中乃佔大比數，反映政府的語言政策是歧視華人，種族待遇不平等。

至 1974 年時，港英政府新增中文作為官方語言，打破了過往只有英文是官方語言的壟斷局面。可見，政府在語言方面大大改善了種族待遇，作為華人社會的香港能夠以中文為官方語言。

(a) 推斷香港人對香港前途問題的一項憂慮。

(3 分)

參考答案

憂慮是擔心中國會於 1997 年後收回香港。

資料中多達 70%受訪者期望「維持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現狀」，反映大部分港人希望繼續維持現狀，不希望回歸到中國的管治，憂慮現況會有所改變。

僅有 4%受訪者期望「被中國收回並受中國管治」，反映只有極小數港人願意回歸到中國管治，大部分港人卻不願，可見港人擔憂香港會回歸到中國的管治之下。

(b) 你在題(a)所指的憂慮在 1990 年時是否仍然存在？

(2 分)

參考答案

該憂慮仍然存在。

資料中「困境挑戰 奮勇地面對」反映當時香港仍然面對著困境和挑戰，歌詞鼓勵港人勇敢面對，反映擔心回歸到中國管治的憂慮仍然存在。

資料中「定能突破 戰勝黑暗」反映作者認為黑暗仍然存在，故勉勵港人做好本份，戰勝黑暗，反映題(a)的憂慮仍然存在。

(c) 你是否同意香港前途問題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7 分)

參考答案

我同意此說。

在壓力團體方面，資料 A 是「香港某壓力團體所進行的一項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調查」，反映前途問題使壓力團體備受關注，更透過訪問方式希望收集更多港人意見，政治意識有所提高。

在港人反應方面，資料 A 中只有 9% 人對期望 1997 年後香港的狀況表示「不知道」，相反，多達 91% 受訪者均表達出其意願，反映前途問題使大多港人關注香港政治前景，表達己見，政治意識有所提高。

在流行文化方面，資料 B 雖然是歌詞，但歌詞中「香港是我心」和「實在極不願移民外國 做二等公民」，反映作者極為關注前途問題，懷著一顆香港心，表達其不願移民的意識，更勉勵港人共渡難關，可見流行文化中也滲透了政治意識，此乃前途問題所導致。

就我所知，流行文化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流行文化較少滲入政治意識，其中多以生活元素為主，例如歌詞《半斤八兩》(1976 年) 講述打工仔生活，政治意識較低。

然而，至 1982 年前途問題起，創作人在流行文化中經常流露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感受，例如劉德華歌曲《中國人》希望加強香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可見前途問題令港人在流行文化中大量加入政治元素，政治意識大大提高。

在政黨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香港的政黨數目較少，而且工聯會等組織仍然未轉化為政黨，只為一社福組織，政治意識較低。

然而，至 1982 年前途問題後，港人積極組成政黨、壓力團體等，例如匯點(1983 年)、民建聯(1992 年)等，工聯會也由社福機構轉化為政黨參與選舉，可見前途問題使港人積極透過政治團體以參與香港政治，政治意識大大得到提高。

在投票方面，香港前途問題前，由於大部分港人沒有投票權後，故政治意識相對較低。

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出現，英國下放更多投票權予港人，使港人更加關注政治狀況，例如 1989 年六四事件令港人十分恐懼中國的管治，故於 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中踴躍投票予泛民陣營，以對抗親中勢力，結果使該年立法局選舉中 18 名民選議員多達 14 位是泛民人士。可見，前途問題使港人更加積極利用選票去影響香港政治，政治意識大大提高。

可見，前途問題使港人的政治意識大大提高。

K.W.HO 出題分析

A. 因素

★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單主項)

- 1 「中國因素是塑造 1980-2000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主要因素。」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2 「外在因素是導致香港政治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轉變的最重要因素。」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3 「本地華人是推動香港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力量。」試參考 1945-2000 年間的歷史，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雙主項)

- 4 評估中國因素和英國因素在塑造 1980-2000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一事上的相對重要性。

★ 一果多因及相對重要性類(多主項)

- 5 評估各個主要因素於塑造 1970-97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一事上的相對重要性。

B. 情況

★ 直述及評估類

- | | |
|----|---|
| 6 | 指出並解釋 20 世紀上半葉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特徵。 |
| 7 | 探討 1945 年後英國在香港的統治的主要政治特徵。 |
| 8 | 追溯並解釋香港政治於 1950-97 年間的發展。 |
| 9 | 追溯並解釋 20 世紀期間本地華人在香港政治上的參與。 |
| 10 | 探討香港政府如何處理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民眾移居香港和 1980-9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

★ 兩極化類

- | | |
|----|---|
| 11 | 「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持續增長。」試參考 1960-97 年間的歷史，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
| 12 | 到了 2000 年，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狀況在什麼程度上實現了現代化？試以 1970-90 年代的香港歷史，加以解釋。 |
| 13 | 探討香港於 20 世紀初在什麼程度上不同於 20 世紀末。 |
| 14 | 20 世紀初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特徵在什麼程度上持續至 1997 年？ |

C. 意義

★ 比較類

- | | |
|----|------------------------|
| 15 | 1967 年在什麼程度上是香港政治的轉捩點？ |
|----|------------------------|

中國因素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 1967-97 年間香港的政治發展？

背景 經過了一個半世紀英國的殖民地管治，香港於 1997 回歸中國。 // **立場及架構** 在 1967-97 年間，中國因素成為了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中國的局勢、政策、意識形態等因素均對香港政治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重要性大於英國因素和香港因素。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主旨句 中國局勢大大影響著香港政治的發展。 // **主項重要性** 中國的政治局勢與香港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例如中國在 1966 年起爆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風起雲湧地批鬥走資派，而以工聯會為首的香港左派勢力亦呼應祖國的號召，發起罷工、遊行、示威，反抗英國此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管治。最終，為紓緩港人的不滿聲音，港英政府的事後大量增加與市民溝通的渠道，例如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又於 1982 年進行首次區議會選舉，允許 21 歲或以上並同時在港住滿 7 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投票權，推動了香港地區政治的發展。此外，中國局勢間接促使了民主派陣營的政黨於 1990 年代深受港人支持，因 1989 年中國高壓鎮壓八九民運的事件令港人對中國的管治深感恐懼，故更加支持民主派陣營，希望藉民主派人士以爭取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避免回歸後陷入中國的專制管治，結果導致 1991 年立法局選舉，18 名直選議員中就多達 14 名是來自民主派陣營。 // **小結** 可見，中國局勢推動了香港地區政治的發展和民主派議員獲得港人支持。

中國政策因素也影響著香港政治的發展。由於中國希望收回對於香港的主權管治，因此在 1982 年開始與英國就香港的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並最終在 1984 年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會於 1997 年回歸中國，並訂立了「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等原則。在一國兩制方面，為了確保香港回歸後不會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英國政府加快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希望將民主植根於香港，例如在 1985 年分別於立法局進行首次間接選舉及在區議會取消了全部的官守議席，提高立法局及區議會的人民代表性。及後，港督彭定康更於 1992 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改革立法局，全部 60 個議席均改由選舉產生，大大加快了香港政治的民主化步伐。在港人治港方面，為培訓回歸後的領導班子，港英政府逐步委任華人出任司級官員之職，例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先後於 1993 年及 1995 年出任布政司及財政司。至香港於 1997 年回歸後，華人董建華成為了首任香港特首，至於司級官員也全由華人出任。可見，中國的政策因素加速了香港民主化改革及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

中國意識形態因素也影響著香港政治的發展。由於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主張一黨專政，權力屬於黨所有，故中國透過直接及間接的方式加強對香港政治的控制，令香港政治變得更加專制。在直接方面，隨著中國對於彭定康的 1992 年政改方案(其中立法局 60 席全部經由選舉產生)不滿，認為立法局的民選成份過高，擔心令影響到往後建制派在立法會的地方，故在 1996 年另籌「臨時立法會」，並於 1997 年回歸後取締了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導致該批議員被迫「下車」，改變了香港政治歷史的發展。此外，間接方面，中國積極支援在港的親中派別發展，包括民建聯及工聯會等。在中國籌組的「臨時立法會」(1996 年)中，建制派便佔了大多數，更成為了首屆回歸後的立法局議員。更甚，臨立會在回歸後隨即在通過了《立法會條例》(1997 年)，修訂了功能組別議席，令立法會先天性受建制派控制，任何議案在不得中國首肯下，就必然會在分組點票時被否決，確保了中國對香港政治的控制。可見，中國的意識形態因素間接和直接令到香港政治變得更加專制。

雖然英國因素及香港因素也影響了香港政治的發展，但重要性不及中國因素。

主旨句 英國因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之一。 // **他項重要性** 於 1997 年香港回歸前，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發展有著全部的決策權，直接影響了香港政治的發展，例如在 1980 年代前，英國政府無意提高香港的民主成份，故當時未有出現大規模的代議政制改革，但至 1980 年代，英國政府推動代議政制改革，才使立法局能夠引入選舉，至 1992 年英國政府更准許港督彭定康革新立法局，把 1995 年立法局全數 60 席改由選舉產生，大大提高了立法局的代表性。 // **小結** 可見，英國政府對於香港政治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力。

主旨句 然而，中國因素較英國因素更加重要。 // **駁論** 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導致了英國政府進行代議政制改革。過往英國並不希望下放權力予華人，因英國政府恐懼會影響到其殖民統治，故未有在立法局引入選舉。然而，至香港即將回歸到中國的管治，英國政府為了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以免香港回歸後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故大力推動代議政制改革，甚至准許彭定康 1992 年的政改方案，將全部立法局議席改由選舉產生。 // **小結** 因此，中國因素是導致英國政府改革香港政治的主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香港因素也是左右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之一。由於香港在 1966-67 年爆發「六七暴動」，令港英政府進行地區政治的改革，包括提出「民政主任計劃」(1968 年)等，以紓緩港人的不滿。加上，由於港人希望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故在 1980 年代起積極組成政黨以晉身立法局及參加區議會選舉，例如成立匯點(1983 年)、港同盟(1990 年)等，使政黨於 1980 年後遍地開花。可見，香港本地因素也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中國因素的重要性大於香港因素。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是導致香港「六七暴動」出現的原因。由於中國在 1966 年起爆發「文化大革命」，結果在港的左派勢力響應中國號召，才引致「六七暴動」的出現。此外，同樣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才是港人能夠全面參與香港政治的主因。因中國與英國確立了「港人治港」的原則，並且導致英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才使港人活躍起來，成立組黨以參與選舉，故中國因素才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根本因素。因此，中國因素才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主因。

總括而言，雖然英國因素及香港因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但重要性遠遠不及中國因素。至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中國對香港政治更有著全部的決策權，對香港政治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字數：2349

考生答卷示範 (一)

分數：_____/15

To a large exten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the period 1967-97 was a result of the China factor, with China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creasing Chinese particip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Firstly, the increasing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spect was a result of the China factor. Due to the 1984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the China government was going to get back the 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and it declared that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declaration. Thu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aved way for the handover. In 1950s, there were only 20000 civil servants who were Chinese, while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200000 until 1997. Moreover, for senior officials, Anson Chan was appoint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in 1993 as well as Donald Tsang was appointe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f Hong Kong in 1995. This shows that due to the signing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more Chinese resident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increased the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spect. It was a result by China factor.

Secondly,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was also a result by the China factor. As the June 4th Incident happened in 1989 in China, people afraid that after the handover China would still use out oppressive method to rule Hong Kong even there was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signed in 1984. Thus, the residents would like to actively engage in politics and formed political parties. For example,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DAB and the HKFTU were formed as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of Hong Kong. Also,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China led to people who voted for the democratic parties, resulting in more than half of them were come from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a’s June 4th movement led to Hong Kong political parties’ foundations in the year 1980s-90s. This showed that it was a result of China factor.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some other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uch as the local factor and the British factor. However, their significances were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China factor.

For the local factor which was not China factor, after the 1967 riots, many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revealed that they had discont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limited Chinese participations in political aspect in the government. For example, at the 1970s, there were still official members in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 which there was no direct elections of Hong Kong People to the two councils. This led to Hong Kong people would like to engage in Hong Kong's politics and hence resulted an increasing Chinese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is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hina factor. Although the Hong Kong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fter the 1967 riots to ease their discontent. Ye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igning of the 1984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emphasis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could let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have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s, such as the appointment of Anson Chan as the Chief Secretary in 1993, showing the China factor was the main factor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Moreover, the British factor also paved the way for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mployed 200000 civil servants in the 1990s. Moreover, it started the first direct election of the Leg-Co and extended the seats to 60 in 1995, which allowed more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 Meanwhil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xcept the governor, they had Chinese people as Donald Tsang 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1995. This shows that British factor had contributed to more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hina factor was more important. As Hong Kong was to b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signed in 1984.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nly chang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declaration to paved the way for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Therefore, as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as initiated by China which was the China factor, leading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make changes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ence, the China factor is more important.

To sum up, although the local factor and the British factor also led to changes and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s of Chinese in term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y were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China factor.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as a result of the China factor in 1967-97 to a large extent

字數：789

考生答卷示範 (二)

分數： _____ /15

From 1967-1997,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went drastic changes and it was the result of China factor to a large extent.

Firstly, from 1967-1980s, Hong Kong's slightly increasing representativeness and loc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t was due to the 1966-67 Riots which was brought b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ese support. From 1966 to 1967, which occurred with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nationalism was boosted and spread to Hong Kong, with Chinese revolutionists coming to Hong Kong to provide support in 1966-67 Riots. As such, the influence or pressure of local group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creased, pressuring British government to initiated changes to people who were more national with. Also, as British government wanted to prolong administration and reduce locals desire to return back to China and resist communism. Britain government started to establish representatives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instance, there was improvement in administration as reflected by setting up of officers or unofficial in Leg-co members and more administrative bodies e.g. Consumer Council to gather public opinions so as to panty people.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with setting up of City District Officers in 1969, abolishing official seats in Urban Council and expansion of Leg-co and Exe-co was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so as to allow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Also, localization of civil service occurred with more Chinese involvements as to satisfy people's desires as shown by 1966-67 Riots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support., avoiding Hong Kong to form communist.

Secondly, from 1986s to 1990s,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n 1984 sped up even more radical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In 1984, Margaret Thatcher and Deng Xiao Peng agreed to allow China to resum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in 1997, with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principles. As such colonial government sped up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ness as reflected by localization of civil services. In 1980s, for instance, percentage of Chinese government secretaries reached 40% up from only 19% in 1970. Also, indirect election of Leg-co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oral colleges, increasing representativeness. In 1991, direct election of Leg-co was introduced with direct participants of locals i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ll 60 members were elected and more were appointed. President of Leg-co was also elected from and by Leg-co members, showing increasing representativeness as British government wanted to empower Hong Kong locals to rule themselves after handover in 1997, as stated in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Plus, white paper was set to discuss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in 1984 so as to check Hong Kong with more democratic to rule themselves after 1997 handover. Moreover,

political parties e.g. Liberal Party and Democratic Party were set up in 1980s as Hong Kong locals were in favor of. Closer and closer handover of China wanted to increa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ather public opinions so as to improve to rule Hong Kong after handover.

Thirdly, China led to handover in 1997, which led to the setting up of a full Chinese member provisional Leg-co and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1997, as China controlled Hong Kong again, she declared no through train for Governor Patten's Leg-co reforms, giving rise to provisional Leg-co in civil all 60 members were selected by. Chinese Basic Law was also drafted.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 e.g. Donald Tsang, Anson Chan etc. even entered in Leg-Co and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Political parties e.g. Democratic party also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making sure Chinese rule over Hong Kong would follow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showing active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ought by Chinese handover in 1997.

Despite so,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as also caused by other factors.

Increasing status of local people was one of the factors. As Hong Kong locals received more education and earned more money in economic take off in economic take off since 1970s, Hong Kong people e.g. Anson Chan, became very capable and could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e.g. rul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becoming Leg-co members.

Yet, this was less important as Hong Kong people in fact were already increasing in education level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However, it was because of Chines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in Hong Kong which was the root cause affecting government. Localization policies to increase Hong Ko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a very large scale.

Also, another factor was increasing political concerns and awareness of Hong Kong locals. Due to economic take off, Hong Kong people had stronger sense and self-belongings to Hong Kong and wanted to improve Hong Kong by voicing out their concerns.

Yet, this was less important as China in fact led to Cultural Revolution, spreading nationalism to Hong Kong people, showing that China factor was more fundamental.

Also, China played significant role in economic take off, boosting Hong Kong people's sense of belongings. For instance, China engaged in long-term arrangement and full localization policy in Hong Kong,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increasing Hong Kong people's political awareness.

Thus, to a large extent, Hong Ko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was due to China factor.

字數：846

「中國因素是塑造 1980-2000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主要因素。」

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背景 經過了一個半世紀英國的殖民地管治，香港於 1997 回歸中國。 // **立場及架構** 在 1980-2000 年間，中國因素成為了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中國因素左右了香港代議政制、政黨政治、公務員本地化的發展，其重要性大於英國因素和香港因素。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主旨句 其一，中國因素在 1980-2000 年間接及直接影響了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 // **主項重要性** 在間接影響方面，由於中國與英國於 1984 年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會於 1997 年回歸中國。為了避免香港回歸到中國後會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英國政府加快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希望將民主植根於香港，例如在 1985 年分別於立法局進行首次間接選舉及在區議會取消了全部的官守議席，提高立法局及區議會的的人民代表性。及後，港督彭定康更於 1992 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改革立法局，全部 60 個議席均改由選舉產生。至於直接影響方面，中國政府對於急進的政改方案十分不滿，指責方案有違《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另籌「臨時立法會」，並於 1997 年回歸後取締了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導致該批議員被迫「下車」，直接改變了香港政治歷史的發展。 // **小結** 可見，中國因素間接及直接影響了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意義非凡。

其二，中國因素塑造了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由於香港需要於 1997 年回歸到中國的管治，驅使港英政府推行代議政制改革，放寬選舉權，以加強香港的民主成份，結果吸引了不少人士或組織成立政黨以參與立法局及區議會選舉，例如民主黨、民建聯及工聯會，成為了香港政黨政治萌芽的要因。此外，中國因素間接促使了民主派陣營的政黨於 1990 年代深受港人支持，因 1989 年中國高壓鎮壓八九民運的事件令港人對中國的管治深感恐懼，因此更加支持民主派陣營，希望藉民主派人士以爭取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避免回歸後陷入中國的專制管治，結果導致 1991 年立法局選舉，18 名直選議員中就多達 14 名是來自民主派陣營。再者，中國因素也直接影響了政黨的發展，因民建聯及工聯會等建制派獲得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在中國 1996 年籌組的「臨時立法會」中，建制派便佔了大多數，更成為了首屆回歸後的立法局議員。可見，中國因素左右了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主因。

其三，中國因素推動了香港公務員本地化的發展，對香港政治發展影響重大。由於中國與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已經確立了「港人治港」的原則，令港英政府需要加快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以過渡至日後的港人治港。因此，港英政府不但提高了華人公務員的人數和比例，如聘請更多的華人公務員，使華人公務員人數由 1980 年的 124,950 人增加至 1990 年的 188,393 人，而比例上亦由 1980 年的 97.61% 進一步增加至 1990 年的 98.68%，令更多華人可以參與對香港的管治。更甚，高級官員的轉變尤其明顯，因 1980 年前未曾有華人擔任司級官員，但至 1984 年中國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港英政府逐步委任華人出任司級官員之職，例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先後於 1993 年及 1995 年出任布政司及財政司。至香港於 1997 年回歸後，華人董建華成為了首任香港特首，至於司級官員也全由華人出任。可見，中國因素推動了香港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雖然英國因素及香港因素也影響了香港政治的發展，但重要性不及中國因素。

主旨句 英國因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之一。 // **他項重要性** 於 1997 年香港回歸前，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發展有著全部的決策權，直接影響了香港政治的發展，例如在 1980 年代前，英國政府無意提高香港的民主成份，故當時未有出現大規模的代議政制改革，但至 1980 年代，英國政府推動代議政制改革，才使立法局能夠引入選舉，至 1992 年英國政府更准許港督彭定康革新立法局，把 1995 年立法局全數 60 席改由選舉產生，大大提高了立法局的代表性。 // **小結** 可見，英國政府對於香港政治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力。

主旨句 然而，中國因素較英國因素更加重要。 // **駁論** 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導致了英國政府進行代議政制改革。過往英國並不希望下放權力予華人，因英國政府恐懼會影響到其殖民統治，故未有在立法局引入選舉。然而，至香港即將回歸到中國的管治，英國政府為了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以免香港回歸後受到中國的專制管治，故大力推動代議政制改革，甚至准許彭定康 1992 年的政改方案，將全部立法局議席改由選舉產生。 // **小結** 因此，中國因素是導致英國政府改革香港政治的主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香港因素也是左右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之一。隨著二次大戰後香港經濟的起飛和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湧現，他們政治意識較強，在滿足經濟利益後進一步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成為香港政治的新勢力。加上，由於港人希望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故在 1980 年代起積極組成政黨以晉身立法局及參加區議會選舉，例如成立匯點(1983 年)、港同盟(1990 年)等，使政黨於 1980 年後遍地開花。可見，香港本地因素也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中國因素的重要性大於香港因素。就因果關係而言，中國因素才是港人能夠全面參與香港政治的主因。因中國與英國確立了「港人治港」的原則，並且導致英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才使港人活躍起來，成立組黨以參與選舉，故中國因素才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根本因素。再者，就影響力而言，中國因素的影響力遠遠大於香港因素，因中國因素可以直接干預香港政治的發展，例如中國不滿 1995 年所選出的立法局結果，結果另組「臨時立法會」，並於回歸後取締了 1995 年該屆的議員，反映中國因素的影響力遠大於本地因素。因此，中國因素才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主因。

總括而言，雖然英國因素及香港因素也是塑造香港政治發展的成因，但重要性遠遠不及中國因素。至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中國對香港政治更有著全部的決策權，對香港政治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字數：2215

追溯並解釋香港政治於 1950-97 年間的發展。

架構 香港政治於 20 世紀下半葉至 1997 年期間出現了顯著的轉變，仔細端詳，1950-97 年間的香港政治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有限度的改革時期(1950-67 年)、全面的行政改革時期(1967-84 年)、代議政制發展時期(1984-97 年)，以下將逐一描述並解釋。

主旨句 第一階段是香港政治有限度的改革時期(1950-67 年)。// **概括部分** 此時期，香港政治的發展主要圍繞著行政機構的擴展及公務員本地化，但在行政、立法等方面則未有革新性的改革。// **歸納範疇一** 在行政機構方面，政府於 1950 年末起設立了大量的行政機構，例如社會福利署(1958 年)、新聞處(1959 年)等，提供更多的官方服務及訊息。// **歸納範疇二** 此外，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愈來愈多的華人獲聘請為公務員，由 1952 年時的 22,900 人劇增至 1962 年時的 48,277 人，其中，雖然港府於 1948 年才開始委任首位華人作為政務官，但至 1967 年，就有多達 20% 的政務官為華人，反映公務員本地化的進展迅速。// **歸納範疇三** 不過，行政及立法兩局在此時期的轉變未算明顯，官守議員的數目仍然多於非官守議員，政府未有下放更多的權力予行政、立法兩局。// **小結** 可見，此階段香港政治只出現有限度的改革，而改革只是著重於行政機構及公務員本地化方面。

主旨句 人口的劇增及英國的顧忌塑造了第一階段香港政治出現有限度的改革。 // **論點一** 二次大戰後，戰後的嬰兒潮及難民潮使香港人口劇增，1950 年的香港人口已超過 200 萬。人口的劇增使港英政府需要成立更多行政機構及聘請更多公務員，以協助管治香港。因此，1950 年代起大量行政機構湧現，同時也聘請大量華人任職公務員，令華人公務員人數倍增。 // **論點二** 與此同時，英國不願大規模改革立法、行政兩局，原因在於 1949 年共產中國的建立使港英政府恐懼共產主義勢力會滲入政府，故不願在兩局引入選舉，只是在 1952 年恢復了日治時期廢除的市政局選舉，並將選舉產生的議員數目增至 8 名。 // **小結** 可見，人口的劇增及英國的顧忌使香港政治出現了有限度的改革。

第二階段是香港政治全面的行政改革時期(1967-84 年)。此階段，香港政治在地區上出現更多革新的轉變，而且更推行了全面的民生政策，改革層面進一步擴大。在地區改革方面，政府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及後，更於將香港劃分為 18 區，於 1982 年進行首次區議會選舉，准許 21 歲或以上並同時在港住滿 7 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投票權，反映地區政治上出現了嶄新性的轉變。在民生政策方面，政府推行了十年建屋計劃(1973 年)、公共援助計劃(1973 年)、九年免費教育(1978 年)等，民生政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可見，此階段香港政治出現了全面的行政改革，轉變十分顯著。

暴動的出現及人口的持續劇增使香港政治於 1967-84 年間出現全面的行政轉變。六七暴動反映了港人極度不滿港英政府的管治，令港英政府知道需要吸納更多華人進入政府，並且建立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例如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減低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此外，政府為了紓緩低下階層的不滿，推出了多方面的民生政策，包括房屋、教育、社會福利等等，成為香港政治在民生政策方面的轉捩點。同時，香港的人口增長持續，至 1967 年時香港人口已劇增至 372 萬，人口增長令社會對於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及醫院等方面的需求大大提昇，因此令政府推行更全面的民生政策改革，以滿足人口需求。可見，暴動的出現及人口的持續增長使香港政治於此階段出現多方面的行政轉變。

第三階段是香港政治的代議政制發展時期(1984-97 年)。代議政制的發展在此時期發展十分迅速，不論在地區或中央層面均大大提高民選成份，同時港人治港的方針大大得到落實。在地區方面，港府於 1985 年取消了區議會的全部官守議席，及後又於 1994 年取消全部委任議席，並將選民資格由 21 歲調停至 18 歲，大大推動了地區直選，同時也擴大了選民數目。此外，立法局也逐步引入選舉，於 1985 年舉行首次間接選舉，56 名議員當中，有 24 名由選舉團及功能組別選出，至 1995 年，立法局全部 60 席均改由選舉產生，大大落實了代議政制，加快了民主化的進程。再者，港人治港的原則也得到實現，司級官員之職逐步由華人出任，如陳方安生、曾蔭權先後出任布政司及財政司，華人已經成功躋身司級官員之列。可見，此時期是代議政制的發展期，政府的代表性不斷增高，而且華人開始任職高級官員。

第三階段的香港政治發展主要是基於香港將會在 1997 年回歸中國。由於中、英已於 1984 年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並落實「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方針。於回歸的過渡期間，港英政府希望加快香港民主化的進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奠定香港的民主根基，以免香港在回歸中國後受到專制統治所影響。因此，港英政府在地方及中央等層面進行了大規模的代議政制改革，甚至於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取消委任議員，全部改由選舉產生。此外，為培訓回歸後的領導班子，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香港政府開始委任華人作為高級官員，至香港回歸前，除了港督及英軍司令由英國人擔任外，其他的司級官員均由華人出任。可見，英國因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而大力推行代議政制改革，使香港政治的民主成份大大得到提高。

總括而言，香港政治於 1950-67 年的有限度改革時期發展至 1967-84 年的全面行政轉變時期，及至 1984 年，更開展了代議政制的發展，大大加快了民主的步伐，使香港的民主成份於 1997 年回歸前得到大大的提升。

字數：2180

「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持續增長。」試參考 1960-97 年間的歷史，評論此說能否成立。

於 1960 年起，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逐步獲得提高，最後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後更成為了決定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故題目所言確能成立。以下，將會從三局、高級公務員、政務官、整體公務員、華人組織、普通市民方面討論華人對香港政治參與的轉變。

市政、立法及行政三局的轉變也能反映華人在香港政治上的參與不斷提高。儘管港英政府在 19 世紀末開始委任華人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並且於 1936 年允許市政局有選舉的成份。然而，在 1960 年代，華人在市政、行政及立法三局所佔的人數十分少，例如在 1962 年時僅分別佔 5 名、3 名及 11 名。但隨著後來港英政府不斷放下權力，吸納本地華人精英進入政府以協助管治香港，使更多的華人能夠晉身三局，例如在 1978 年三局的華人議員人數上升至 23 名、6 名及 19 名。及後，由於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港英政府大幅增加行政局的華人議員人數至 9 名(1996 年)，佔整體議員的 75%，以準備過渡至回歸，使華人對香港政策的參與大大得到提高。可見，華人在三局的參與不斷得到提高。

高級公務員方面的轉變也能反映華人的政治參與度不斷提高。於 20 世紀中葉，政府高級公務員之職，包括司長級官員、處長等全部由外籍人士出任，沒有華人能夠擠身高級官員。然而，至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起，為了逐步落實「港人治港」的原則，培養回歸後的管治班子，英國政府逐步委任華人出任高級公務員。例如在處長級別方面，1989 年李君夏獲委任為警務處處長，成為首位華人警務處處長。及後，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情況更進一步向上發展，至 1990 年代更陸續有華人獲委任為司級公務員，例如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於 1993 年和 1995 年獲委任為布政司及財政司，打破了過往由外籍人士壟斷的傳統。直至 1997 年回歸前，除了港督和英軍司令外，大部分司級官員均由華人出任。可見，華人在高級官員方面的參與程度逐步提高，於 1997 年回歸後成為了香港的管治班子。

政務官方面也能反映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不斷提昇。傳統以來，政務官被視為是培訓人材用作擔任往後高官之職，因此，政務官之職多由外籍人士出任。至 1948 年，徐家祥才成為了首位華人政務官。在 1960 年代初，也只有很少數的華人可以晉身政務官之職，例如在 1962 年，華人政務官與外籍政務官的人數分別是 12 人及 66 人，比例是約 1:5.5，顯示華人在政務官方面的參與程度很低。但隨著經濟發展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多華人晉身上層社會，故華人政務官的數量也不斷上升，至 1970 年時上升至 40 人。及後，在 1978 年時更上升至 91 人，與外籍政務官的比例縮窄至 1:1.25，華人對於制定香港事務的參與程度也大大得到提高。可見，華人在政務官方面的參與程度也不斷獲得提昇。

整體公務員方面的情況也能顯示華人的政治參與度不斷提高。雖然華人公務員一向是佔了整體公務員人數的大多數，例如在 1962 年，華人公務員人數有 48,277 名，已經佔了整體公務員人數的 96.74%。隨著往後人口和行政機構日漸增加，港英政府需要聘請更多華人公務員以協助管治香港。至 1972 年時，華人公務員人數已達 88,121 人，佔了整體公務員的 97.88%。往後，此百分比更進一步增至 1990 年的 98.68%，人數達 188,393 人，成為了支撐及維持香港政府運作的重要力量。可見，華人公務員的人數及比例增長也可反映華人對香港政治的參與不斷提高。

從社團及政黨方面也可反映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程度不斷增加。於 1960 年代，華人社團主要是提供社福功能，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機構興辦學校、醫院等。另外，儘管鄉議局協助港英政府與新界原居民溝通，協助推行地區政策，但鄉議局並非直接影響政府政策，僅是扮演諮詢和輔助施政的功能。然而，隨著 1980 年代港英政府大力推行代議政制改革，逐步允許市民選出地方的區議員和立法局議員，使許多港人以組織政黨的方式參政，結果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包括港同盟(1990 年)、民建聯(1992 年)等。這些政黨透過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晉身地方及中央政治，影響著香港政治的決策。可見，華人組織的發展也能反映華人在香港政治上的參與不斷提高。

從普通市民的參與也能反映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斷提高。於 1960 年代初，政府在推行政策時鮮有諮詢華人的意見，但由於六七暴動反映本地華人對香港政府的管治十分不滿。因此，於暴動後，政府推行改革以吸納本地華人的意見，例如於 1968 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及後，政府更於 1982 年進行區議會選舉，允許 21 歲或以上並同時在港住滿 7 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投票權，登記選民人數接近 90 萬人。往後，本地華人更積極支持透過投票方式以影響香港地方政治的發展，加上政府在 1994 年時將選民年齡下調至 18 歲，令登記選民人數進一步上升至 380 萬人，更多華人能夠利用選票以影響地區政治。可見，普通市民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也不斷獲得提昇。

總括而言，從三局、高級公務員、政務官、整體公務員、華人組織、普通市民方面也能反映華人對香港政治的參與在 1960-97 年代不斷得到提高。於 1997 年回歸後，華人對於香港政治更有全面的掌握。因此，題目所言確能成立。

字數：1959

考生答卷示範

分數：_____/15

我同意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在 1900-97 年間持續增長，現從吸納地方精英，議會代表性，公務員本地化，代議政制及政黨數方面分析之。

首先在吸納地方精英方面，政府在 1960 年代推行地方行政。受 66-67 暴動影響，及香港人口平水增加，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即按各區需要，施行相應的政策，在 1969 年，政府推出民政主任計劃，在香港島、九龍各區設立民政署，一方面各區市民宣傳政府政策，一方面以地方諮詢及吸納市民的意見，並吸納地方精英，各界人士作諮詢對象作為政府與市民之利的溝通橋樑。相比以往華人社團(東華三院)及華人精英(周壽臣 1926)香港人參政機會明顯上升。

此外，政府又在 1960 年代相繼設立諮詢委員會，例如禁毒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等，透過吸納華人進入委員會，政府參考各方訴求，完善政策，例如華人張緣萍便是消委會成員之一。

另外，政府在 1981 年推出《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在 1982 年設立區議會，在全港設立 18 區。市民除了能透過選舉晉身議會外，當時部分選民亦能參與選舉投票，華人參政渠道增加。

另外，在議會代表方面，受中英聯合聲明(1984)、香港前進問題、華人教育水平提升影響下，政府在 80 年代加快代議政制的發展，代議政制是指市民選出屬於代表，在議會代表自己發聲。香港的政制改革是由下而上開始，由地方至中央層面。在市政局方面，市政局在 1973 年廢除所有官守議席。並在 1995 年推行全民直選，除了委任議席外，官守議席被全面廢除外，選民資格亦大增，凡年滿 18 歲香港永久居民才可參與選舉，而且仍保留委任、官守議席。促進代議政制的發展，區議會在 1994 全面廢除委任議席，並大幅擴大選民基礎。選舉資格與市政局相同：凡年滿 18 歲永久居民使可投票。

此外，在區議會方面。以往立法會從未舉行過代議政制轉趨成熟。在 1995 年，政府首次讓立法會推行直選，所有委任議席被廢除，此次直選意義重大，事實上，自麥理浩上位以來，他不斷擴大立法會的非官守議席人數，在 1980 年代，非官守議員中有 80%是華人。市民首次有機會以選舉方式晉身立法會的中央層面政治架構，市民也可投票選舉代表，選舉資格與區議會相同。可見華人政治參與不斷上升。

另外，在行政局方面，在麥理浩在任事期他不定期增加非官守議席，在 1960 年代末，非官守議席首次超過官守議席。華人精英得以進入中央政治架構。相比 20 世紀初只有少數華人如周壽臣，雖能晉身行政局，1960-97 年間華人政治參與機會明顯持續增加，代表人物如鍾士元。

此外，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隨 66-67 暴動，香港人口不斷上升影響，政府漸關注民生，以完善社會公眾服務需求，因而大增聘用華人，至 90 年代前，華人擔任政務官(AO, EO)的人數大幅增加。另外香港前途問題亦讓華人晉身高級公務員，例如在 1990 年代，陳方安生曾為華人布政司，及曾蔭權打破英國人長期壟斷政府高層層面，華人參政機會不斷上升。

此外在政黨政治方面，隨代議政制的發展，香港政治亦漸發展成熟，在 1990 年代有不少政黨成立，包括民建聯、自由黨、民主黨。華人能以以參選方式進入立法會，為市民發聲。

最後，普通市民參與渠道不斷上升，在二十世紀初又有擔任陪審團資格，懂英文的華人精英才可以投票。但在 1960-97 年間，華人選民基礎不斷擴大，由所有年滿 21 歲永久居民，擴展至 90 年代，所有年滿 18 歲永久居民均可投票，選舉於代表。可見華人政治參與機會不斷上升。

雖然華人參政機會在 1960-97 年不斷增長，但亦有部分局限。

例如立法會雖廢除委任議席，但仍沒「功能組別」以間選方式選出代表，佔立法會議員一半。令立法會未能達至全面普選。

此外，立法會 1995 年的選舉結果更被中國政府所否定，要求在 1997 回歸前「全部下車」，這些都阻礙華人參政機會。

總言之，華人在 1960-97 參政機會不斷增長，受地方行政及代議政制的影響下，華人參政會大增。雖然參政機會仍受部分阻礙，如立法會但相比二十世紀初或 1960 年代初，無可否認華人的參政機會大增，擔任角色越重要。

字數：1523

探討香港政府如何處理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民眾移居香港和 1980-9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架構 港英政府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內地民眾移居香港及 1980-90 年代的前途議題時用上了不同的方法應對，其中在解決內地移民所帶來的問題時，則透過成立更多行政機構、推行更全面的民生政策、推廣節育及實行人口政策以應對；在處理香港前途議題所帶來的問題時，則透過推動代議政制、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以解決，以下將從上述各個論點討論。

主旨句 港府成立更多行政機構以處理中國內地民眾移居香港所帶來的問題。 // **問題 A 的段落內容** 二次大戰後，內地大量民眾移居到香港，使香港人口劇增。但人口的持續增長對政府各項服務的需求構成壓力，同時，原有政府機構的職能也未能專責應對因人口持續上升而產生的問題，例如入境犯罪活動的增加等，故對政府的管治造成挑戰。因此，政府於 1950 年代末起設立了大量的行政機構，包括於 1958 年改組社會局為社會福利署，為有需要市民提供緊急的實物援助；成立入境處(1961 年)執行海、空兩路的出入境管制及打擊出入境犯罪活動等，以應對大量民眾移居到香港所產生的問題。 // **小結** 可見，港府增設大量行政機構以處理內地移民潮來到香港所帶來的問題。

港府推行更全面的民生政策以處理內地民眾移居到香港所產生的問題。在 50-60 年代的內地移民潮中，大部分的移民均是低下階層，經濟條件較差，居住在較惡劣的環境，如籠屋及木屋區等。而且，他們的子女也因經濟困難而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上述的情況容易積累出內地移民對政府的不滿，動搖政府的管治，其中六七暴動就是低下階層對政府不滿的反映。因此，政府於 60 年代末起大力推行民生政策，例如在社會福利方面提出公共援助計劃(1973 年)，提供援助予弱勢社群；在房屋方面推出「十年建屋計劃」(1972 年)，計劃興建大量公屋予 180 萬香港居民；在教育方面推行六年免費教育(1971 年)，為 6-12 歲適齡兒童提供基礎教育，以此緩和低下階層對於政府的不滿，穩定港府管治。可見，港府大力推行民生政策以應對內地民眾移居到香港所帶來的問題。

港府推廣節育及實行人口控制政策以應對內地移民到香港所帶來的問題。隨著大量內地民眾於 50-60 年代移居到香港，香港的人口增長迅速，由 1950 年的約 197 萬激增至 1960 年的約 307 萬。由於華人素來受傳統家庭觀念影響，生育率較高，故令人口增長不斷膨脹，對社會資源、福利等都構成嚴重的壓力。為此，港府積極推廣節育，透過家計會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提倡「兩個夠晒數」，以消弭傳統大家庭的生育觀念。此外，政府又於 1970 年代推行陸續接辦了 32 間家計會母嬰健康院內的節育指導所，並且推出經腹結紮手術及終止懷孕等服務，以遏止人口的急速增長。再者，為避免內地移民繼續湧入，政府也於 1974 年推行「抵壘政策」，以減少內地人移居到港。可見，政府積極推廣節育及推行人口政策以應對內地民眾移居到香港所產生的問題。

從上可見港府處理 1950-60 年代大量中國內地民眾移居香港所帶來的問題的方法，以下，將討論港府如何應對香港前途議題所產生的問題。

主旨句 港府推動代議政制的改革以處理香港前途議題所帶來的問題。 //

問題 A 的段落內容 隨著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香港將會於 1997 年回歸中國。然而，英國政府擔心香港回歸中國後會受到共產主義的管治而變得專制，失去民主。加上，不少港人對於回歸共產主義的中國感到恐懼，引發 90 年代的移民潮。因此，在此問題上，英國政府授權港府積極進行代議政制的改革，為香港奠定民主，同時加強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如逐步取消立法局、區議會、市政局的官守和委任議席，並且增加民選議席。此外，港督彭定康更於 1992 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改動立法局的組成方式，於 1995 年，立法局全部 60 席均改由選舉產生，使立法局的民主成份大大提高，以奠定民主基礎，減少回歸後香港政治受到中國的專制模式所影響。 // **小結** 可見，港府積極推動代議政制以應對香港前途議題所帶來的問題。

港府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以處理香港回歸中國的交接問題。由於中國將會於 1997 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港英政府因而面對回歸所產生的管治班子的交接問題。因過往港府的高級官員職位均由外國籍人士壟斷，華人難以擠身高級官職，如果情況持續，將來對回歸後的管治班子形成重大的挑戰。為此，港府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積極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陸續委任華人代替外籍高級公務員，例如於 1993 年委任陳方安生為首位華人布政司，及後又委任曾蔭權為首位華人財政司。至 1996 年，除了港督及英軍司令外，主要的官員均由華人出任，以培訓管治班子，順利於回歸後繼續協助管治香港。可見，港府落實港人治港的方針以應對香港回歸帶來的交接問題。

總括而言，港府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以應對 1950-60 年代大量內地民眾移居香港及 1980-90 年代香港前途議題所帶來的問題，而這些方法大致取得成效，使問題得到處理。

字數：1831 字

1967 年的暴動在什麼程度上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參考 20 世紀期間的香港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立場 1967 年的暴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暴動，事後，港英政府為了緩和人民的不滿聲音，掀起了大規模的改革運動，使 1967 年後的政治及社會方面出現了許多的轉變，在大程度上是轉捩點。 // **架構** 以下，將印證政府對民意的重視態度、法定公營機構及反貪運動、社會福利措施等方面是轉捩點。

主旨句 政治方面，1967 年暴動令政府對民意的重視態度由輕視改變為重視，為一轉捩點。 // **核心點前** 1967 年暴動前，雖然政府在施政時會諮詢本地華人社團的意見，例如鄉議局(1926 年)就是政府與新界鄉民溝通的橋樑，但政府對民意的重視程度不高，在制訂政策時較少徵收民意，同時也缺乏吸納民意的政府機構，令港人意願往往受到忽視。 // **核心點的影響及核心點後的情況** 然而，1967 年的暴動為港英政府的統治敲響警號。六七暴動歷時近 8 個月，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暴動。事後，港英政府希望透過增加官民溝通的渠道以緩和人民的不滿聲音，避免暴動再次出現。例如，政府於 1968 年開展「民政主任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 10 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及後，於 1982 年更進行首次區議會選舉，允許港人以投票方式積極參與該區的事務，加強人民對政治的參與。 // **對比(~20%)** 相比之下，就政府對民意的重視程度，1967 年暴動前港英政府輕視民意，但六七暴動卻使港英政府產生統治危機，使其於 1967 年後廣設諮詢機構，更允許港人參與地區政治，對民意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是一轉捩點。

政治方面，1967 年暴動是香港法定公營機構及反貪運動出現的轉捩點。於 1967 年前，由於港英政府對民生政策的重視程度較低，故鮮有成立專為改善人民生活的法定公營機構。同時，儘管 1967 年前貪污問題十分嚴重，但當時卻未有足夠的社會壓力令港英政府採取積極措施以打擊貪污，例如沒有成立專責調查貪污的機構。然而，六七暴動的出現一方面使政府意識到必須改善人民生活質素，以緩和社會上的不滿聲音，另一方面反映市民不滿公職人員的貪污情況，令往後出現了大規模的改革。事後，在法定公營機構方面，政府成立了香港房屋協會(1973 年)、消費者委員會(1974 年)及地下鐵路公司(1975 年)等機構，為人民提供各類型服務，以舒緩民怨。在反貪運動方面，政府為挽回形象及民心，於 1974 年成立「廉政公署」，致力消除貪污及推廣反貪污教育，使反貪運動於六七暴動後出現。相比之下，就法定公營機構及反貪運動而言，1967 年香港的法定公營機構不多，且貪污情況嚴重，但六七暴動後，法定公營機構如雨後春筍地湧現，反貪運動亦積極進行，情況大大扭轉，故六七暴動是一個轉捩點。

社會方面，1967 年暴動令政府對社會福利措施的態度由消極改變為積極。於 1967 年前，雖然政府在 1958 年已經將社會局改組為社會福利署，又於 1961 年推行了「廉租屋計劃」，提供社會福利予有需要人士。然而，1967 年前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措施較為消極，規模較小且較多限制，例如「廉租屋計劃」有人息限制，低層市民仍然被排除在外。然而，六七暴動反映了市民對生活抱有極大的不滿，政府為了消除民怨及安撫民心，在 1967 年後推行了排山倒海的社會政策。事後，在救助貧窮方面，於 1973 年推行「公共援助計劃」，提供經濟援助予生活有困難的人士；在房屋方面，於 1972 年推行「十年建屋計劃」，為 180 萬香港居民提供設備齊全的公共屋邨單位；在教育方面，於 1971 年推行 6 年義務教育，及後又於 1978 年提高至 9 年，反映政府在社會福利措施上的態度已變得十分積極。相比之下，就社會福利改革而言，1967 年政府在社會福利措施上的態度消極，但六七暴動完全扭轉了此一情況，政府於 1967 年後推行了大規模的社會福利措施，涵蓋各個範疇，且受惠者眾多，態度十分積極，可見是一個轉捩點。

然而，六七暴動對於部分方面只是延續，而非轉捩點。

政治方面，1967年暴動只是華人精英對政府參與的延續。於1967年前，港英政府已經推行吸納華人精英進入政府以協助管治的方針，例如在政務官方面，1948年徐家祥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在行政及立法兩局方面，1962年時分別有3位及5位華人是該兩局的議員，反映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前已經吸納華人精英參與對香港的管治。至1967年暴動，事件顯示人民對港府統治存有重大的不滿。事後，政府為了緩和市民的不滿聲音，進一步吸納更多華人進入政府，例如在政務官方面，人數由1962年的12人增加至1968年時的23人及1978年時的91人。在行政、立法兩局方面亦然，兩局的華人議員人數於1966-74年間分別由11人增至19人(行政局)及10人增至23人(立法局)，反映愈來愈多華人精英身居政府要職，參與對香港的管治。相比之下，就華人對政府的參與而言，1967年前港英政府已經陸續委任華人精英進入政府，而六七暴動只是加速此一進程，使更多的華人能夠晉身政府高層，因此在這方面而言，六七暴動只是延續而非轉捩點。

經濟方面，1967年暴動並非是香港經濟產業發展的轉捩點。自1959年起，香港的出口額已超越轉口額，顯示經濟已由轉口貿易成功轉型至工業發展，經濟以工業為重心產業。各類型的輕工業在港發展十分蓬勃，例如1950年代的紡織、成衣和塑膠業和1960年代電子、鐘錶及玩具產品等，可見工業在六七暴動前是香港的主要經濟產業。至1967年暴動，儘管暴動打擊了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在60年代後期在港的投資率急劇下跌至不足國內生產總值的20%。然而，此只是短期的影響，並未對香港經濟發展構成根本性的轉變。事後，香港經濟在六七暴動後仍然是以工業發展為主，例如在1970年代，製造業仍然是香港的經濟支柱，在勞動人口及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均佔首位。相比之下，就香港經濟發展而言，六七暴動前後的香港經濟仍然是以工業發展為主，儘管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經濟漸趨多元化，但此乃受中國改革開放而非六七暴動影響，因此六七暴動並非是香港經濟產業發展的轉捩點，只是延續。

總括而言，儘管六七暴動在吸納華人精英及經濟產業發展方面只是轉捩點，但六七暴動對於政府對民意的重視態度、法定公營機構及反貪運動、社會福利措施等方面均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此等轉變大大改變了香港的整體狀態，故大程度上是轉捩點。

字數：2242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在什麼程度上是香港政治發展的轉捩點？試參考 1945-2000 年間的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背景 香港經歷近百半世紀的英國殖民地管治後，中國終於在 1984 年與英國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 // **架構** 然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對香港政治帶來了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是代議政制、高級公務員本地化、政黨政治等多方面發展的轉捩點。 // **立場** 因此，《聲明》的簽訂在大程度上是香港政治發展的轉捩點。

主旨句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是香港代議政制發展的轉捩點。 // **核心點前的情況** 於《聲明》簽訂前，港英政府只是下放有限度的選舉權，於 1982 年開始引入區議會選舉，讓本地居民選出地區上的區議員。但 1984 年前的代議政制發展是十分有限，只是允許地區選舉，但在中央層面的立法局並未有引入選舉制度，所有議員均是由港府委任，代議政制在此時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 **核心點的影響及核心點後的情況** 然而，隨著中國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並且達成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並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由於港英政府擔心香港回歸後會受到中國日趨專制的管治，擔心「一國兩制」等原則未能有效實現，於是在回歸前大力推行代議政制改革。1985 年，港英政府就在立法局引入間接選舉，及後又於 1991 年舉行首次的直接選舉。更甚，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將 1995 年的立法局 60 席全數改由選舉產生，大大推動了代議政制改革，使香港的中央機關都出現選舉。 // **對比** 相比之下，就代議政制發展而言，1984 年前香港的代議政制改革十分有限，僅局限於地區的區議會層面，但《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將代議政制改革擴展至中央的立法局，使政府的核心機關都出現民選成份，是香港政治發展的轉捩點。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是香港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轉捩點。於二次大戰後，儘管港英政府開始委任華人任職政務官，例如徐家祥於 1948 年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但在 1984 年《聲明》簽訂前，港英政府未有進行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為了維持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管治，港督、所有司級和處長級別的公務員均由外籍人士壟斷，本地華人未能擠身核心的管理層。然而，至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確定了香港將於 1997 年回歸中國，並且制定了「港人治港」的原則。為培訓回歸後的領導班子，令香港能夠順利交接至中國管治，港英政府開始逐步委任華人出任司級官員之職。在處長方面，港英政府於 1980 年代末開始委任華人為處長，例如李君夏於 1989 年成為首位華人警務處處長。在司級官員方面，港英政府在 1993 年和 1995 年分別委任陳方安生及曾蔭權成為首位華人的布政司及財政司，使華人能夠晉身司級官員職位。至 1997 年回歸後，華人董建華成為了首任香港特首，至於司級官員也全由華人出任。相比之下，就高級公務員轉變而言，本地華人在 1984 年《聲明》簽訂前未能擠身高級公務員的職位，但《聲明》的簽訂使港英政府需要陸續委任華人任職高級公務員，以培訓華人的管治班子，結果成為了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轉捩點。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是香港政黨發展的重要轉捩點。於《聲明》簽訂前，香港的政黨發展並不蓬勃，儘管有不少華人社團及組織已經存在，例如工聯會在 1948 年已經成立；新青學社(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前身)也於 1975 年成立，但這些社團及組織均不是以政黨的定位而存在，例如工聯會是為工人爭取權益；新青學社則是為青年勞工提供讀書課程。可見，政黨政治在此時期尚未成形。然而，隨著 1984 年中國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恐懼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後會陷入中國的專制管治，於是在回歸前積極推行代議政制改革，在立法局引入選舉。結果，不少人士或組織紛紛成為政黨以參與選舉，希望透過團結相似政見的人士，壯大勢力及增加知名度，使政黨在 1984 年後如雨後春筍般滋長。例如香港民主同盟(1990)、民主建港協進聯盟(1992)、自由黨(1993)及民主黨(1994)等，政黨政治百花齊放。此外，工聯會、新青學社等亦在選舉出現後轉化成政黨參與選舉，例如新青學社於 1985 年改名為街工，以參與區議會及立法局選舉。相比之下，就政黨發展而言，1984 年《聲明》簽訂前，政黨政治在香港的發展尚未成氣候，但隨著《聲明》簽訂後，代議政制改革在香港展開，許多不同政見的人士紛紛組成政黨參與選舉，使政黨紛紛成立，是香港政黨發展的催化劑。

儘管《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在多方面是香港政治的轉捩點，但在地區政治改革方面則是延續。

在地區政治方面，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並非是一轉捩點。港英政府在1984年前已經開始推行地區改革，包括於1967年六七暴動後就開始引入地區諮詢制度，例如1968年的「民政主任計劃」，將香港、九龍劃分為10區，每區設一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及後，又於1982年舉行區議會選舉，將全港劃分為18區，每區設一區議會，部分區議員由人民所選出。此外，市政局方面也在1983年舉行首次的直接選舉，反映1984年前港英政府已經著手進行地區改革，下放地區的選舉權，提高本地居民對於本地事務的參與。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只是延續原本的地區改革措施。例如在區議會方面，港英政府在1985年取消區議會的全部官守議席，及後又於1994年取消全部的委任議席，並將選民資格由21歲調停至18歲。在區域市政局方面，港英政府於1986年在新界地區設立區域市政局，又於1995年取消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內的全部委任議席，使地區選舉變得更具代表性。相比之下，就地區政治而言，1984年前港英政府已經進行地區改革，開始引入選舉，此並非受到1984年《聲明》的簽訂而影響。相反，《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只是再下一城，推行更全面的地區改革。因此，《聲明》的簽訂只是地區政治改革的延續而非轉捩點。

總括而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為香港政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使代議政制由地方層面擴展至中央層面，同時本地華人開始晉身高級公務員，而且政黨政治百花齊放，使香港政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新狀況。因此，在大程度上是香港政治的轉捩點。

字數：2265

探討 1945 年後英國在香港的統治的主要政治特徵。

背景 於二次大戰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香港人口劇增及世界非殖民地化浪潮的發展，英國改變過往在香港的高壓統治，使政治上的管治特徵出現轉變。 //

架構 大體而言，代議政制的擴展、華人地位的不斷提高、公務員本地化的持續、政黨發展愈趨成熟、市民參與度的提昇、公共服務的全面發展就是 1945 年後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主要政治特徵。

主旨句 其一，代議政制的擴展是 1945 年後英國在香港統治的特徵。 // **段落內容** 港英政府在 1945 年後逐步取消市政局、區議會及立法局的官守和委任議席，並不斷增加民選的議席及比例。例如，在市政局方面，1973 年已經取消所有官守議席，改為全部的民選議席。此外，1982 年舉行了首次的區議會選舉，及後更先後於 1985 及 1994 年取消全部官守議席及委任議席，使區議會議員完全由人民投票所選出。再者，立法局方面的議席轉變更加能夠顯示出代議政制的發展，因立法會是政府的核心機構之一，但至《中英聯合聲明》(1984 年)簽訂後，民選議席的數目和比例大幅提高，至 1995 年立法局的全部 60 席議席更改由直選產生，使政府的人民代表性大大得到提高。 // **小結** 可見，代議政制的擴展是二次大戰後香港政治的特徵之一。

其二，華人地位的不斷提高也是港英政府的統治特徵。華人參政的人數及層面不斷增加及提高，不但更多華人進入了行政、立法兩局，例如立法局方面，1966-74 年間華人議員人數由 10 人增至 23 人，至於行政局方面的華人議員人數也於同期由 11 人增加至 19 人，顯示華人對於政治的參與得到提高。此外，至 20 世紀末，更有華人獲委任為司級官員，例如陳方安生(1993 年)、曾蔭權(1995 年)先後出任布政司及財政司。直至 1997 年，除港督及英軍司令外，大部分司級官員均為華人，成為政府領導班子。可見，1945 年後，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及地位不斷得到提昇。

其三，公務員本地化的持續是二次大戰後港英政府統治的特色。於第二次大戰後，華人公務員的比例及人數不斷提高，在 1952 年，雖然本地公務員人數已達 22,900 人，約佔全部公務員人數的 95.56%，但由於人口及行政機構日漸增加，港英政府因而聘請更多華人公務員，令到華人公務員人數日漸增加，至 1990 年，華人公務員人數增加至 188,393 人(佔 98.68%)，反映公務員本地化的持續擴展。此外，華人政務官方面亦然，於 1962 年時華人政務官與外籍政務官人數分別為 12 及 66 人，約 1：5.5 的比例，但至 1970 年華人政務員的人數已增至 40 人，在 1978 年更進一步上升至 91 人，比例縮窄至 1：1.25，反映愈來愈多華人任職政務官。可見，公務員本地化的持續是 1945 年後港英政府統治的特徵。

其四，政黨發展愈趨成熟是港英政府治下的政治特徵。隨著《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的簽訂及代議政制的發展，令到部分華人精英開始籌組政黨，例如民建聯(1992年)、自由黨(1993年)等，以參加區議會及立法局等選舉。此外，更有政黨組成聯合力量，以壯大陣營及勢力，例如匯點與香港民主同盟於1994年合併為民主黨，匯聚民主力量。再者，工會組織也為參與政治以爭取勞工權益而轉化為政黨，例如工聯會及職工盟等，使政黨發展進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可見，20世紀末政黨發展愈趨成熟是港英政府治下的政治特徵。

其五，市民參與度的提昇也是港英政府治下的政治特徵。二次大戰前，香港市民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有限，只有市政局具有有限度的民選成份，但自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廣設諮詢機構，例如於1968年推行「民政處計劃」，把香港與九龍劃分為10個區域，在各區設立民政處以收集民意。加上，港英政府於1974年修訂《法定語文條例》，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使市民能更方便地向政府表達意見，因此有助鼓勵市民對於政治的參與。再者，至區議會成立及革新市政局和立法局後，市民的投票權獲得大大提昇，令到市民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大大得到提高。可見，市民參與度的提昇是二次大戰後英國管治香港的政治特徵。

其六，公共服務的全面發展也是港英政府統治的政治特徵。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的人口劇增，港英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以滿足人口需求，因此成立了大量法定公營機構，包括消費者委員會(1974)、九廣鐵路公司(1982)等，提供不同的需求予市民。此外，政府也於六七暴動(1967年)後致力改善民生福利，例如於 1973 年提出公共援助計劃，及後於 1993 年進一步將計劃更改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協助低收入人士。此外，政府又致力改善教育及屋房福利，例如於 1978 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及於 1972 年宣布推出「十年建屋計劃」，使香港的公共服務漸趨完善。可見，二次大戰後公共服務的全面發展是港英政府管治的特徵。

總括而言，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在 1945 年後出現了轉變，使政治方面漸趨開放，及後在 1997 年回歸中國，落實了「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主要原則。

字數：1812 字

K.W. HO

歷史 HISTORY

考場戰神 · 求敗 · 高考歷史科全卷88%分數奪A

【變強，首先要承認自己的不足】

K.W.HO於會考及高考期間，深知單憑學校教導不足以取得最強成績，因此不斷補習取經，進而歸納技巧，再不斷反覆驗證答題方法，最終於會考取得A級成績，更在高考以88%的求敗分數奪A！

【天才 · 出於勤】

歷史科只有「努力型天才」，並不存在「天賦型天才」。只要透過努力及正確方法，任何人均可以於歷史科獲取佳績。K.W.HO出身於天水圍一所band 2中學，歷史科在中四時候僅取得中游成績，但往後透過不斷積極求學，以及鑽研答題要求及方法，最終於高考取得88%的求敗成績，誰與爭鋒？

【專注 · 極至】

K.W.HO除了高考歷史科獲A外，高考通識科亦以Straight A(三份卷全A)的完美姿態奪A。然而，K.W.HO斷然放棄學生人數較歷史科多近10倍的通識科[^]，專注鑽研、任教歷史科。原因僅單純出於興趣及責任，希望專心致志地教好一科、教好每一個學生，這才是問心無愧。

【革命 · 顛覆所有】

於高考過後，K.W.HO內心有一個很強烈的念頭，就是將他對歷史科所有的研究毫無保留地公諸於世。於是，K.W.HO於19歲時開設了K.W.HO_History Blog (<http://cyruzho.mysinablog.com/>)，記錄他在高考2年來點滴積累的論文、考試心得，供人免費觀看。在他不斷堅持下，累積超過500篇文章，瀏覽人次高達165萬。於2015年，K.W.HO感覺到單純以「網站分享」已經到達了瓶頸，必須有更強大的力量支持方能完成他的革命。所以，K.W.HO加盟英皇教育，親身將答題技巧教授予同學，徹底改變同學對於讀歷史科的思維模式！

【戰績 · 有誰可比？】

連續4年(2016-2019年)蟬聯全港最多DSE歷史科5+、5**學生
歷史科市場領導! 4年合共打造過百名5**學生!
大幅拋離坊間其他導師!
2017年有重考門生由Level 2跳升至5**，創造重考傳奇!
2016年有門生僅用10個月時間新修歷史科取得5**，開創新修傳奇! [^]
[^]根據學生向英皇教育提供的數據或資料分析



K.W. Ho



kwhohistory

